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陳陸輝 博士



離開家庭？社會系絡與
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異同之分析

研究生：簡瑋倩 撰

中華民國一〇二年一月

謝 辭

一直都還記得，是因為愛，讓我來到這裡；如今，我將帶著更多的愛，離開這裡。回頭審視這些日子，跌跌撞撞走得辛苦，卻也是人生中收穫最豐碩的時光。

首先，最要感謝的是我的指導老師，陳陸輝教授，老師雖然身負選舉研究中心主任之重責，但給予學生的協助與關心卻不曾少過。在論文的撰寫上，老師給我很大的空間去發揮，卻也總是在小地方細心提點；在生活上，老師時常給予關懷，並鼓勵我勇敢面對人生路上的挑戰。

其次，感謝我的論文口試委員，陳義彥教授、俞振華教授與劉嘉薇教授，三位老師在百忙之中仔細批閱我的論文，並給予許多指導與建議。義彥老師在研究方法上給予深入的建議，振華老師在資料分析上提醒了許多值得探究的面向，嘉薇老師在架構安排上給予許多寶貴的意見，更謝謝老師們在論文審查期間給予的鼓勵與肯定。

接著要感謝這些日子以來所遇到的你們，百岳，我的好同學與好戰友，謝謝你讓我們相互勉勵著，把這趟路走完；史蒂芬，謝謝你給了我努力的方向與滿滿的鼓勵；老王，謝謝你給了我很多陪伴，和你相處總是自在；范范，謝謝你的創意，總是很有效果；冠儒，謝謝你的義氣相挺，那晚溫馨的火鍋聚會一直烙印在我心底；繼中，謝謝有妳，是我最貼心的夥伴。感謝選研其它老師與學長姐這段時間以來的教導與照顧，豐富了我的研究生生活，學到許多寶貴的經驗。更感謝選研的拱豬戰隊—游老師、錫興學長、宏忠學長、應龍學長與啟耀學長，每天下午五點準時開桌，真是苦悶研究生活最大的樂趣了！除了牌桌上的廝殺之外，也謝謝學長們在課業上與人生上的啟發與提點，優良的拱豬傳統請務必維持下去！另外，感謝宛臻，謝謝妳讓我懂得被了解的美好；感謝張阿伯，總是無條件接收我所有抱怨與苦水，這段日子謝謝有你們陪我一起走過。感謝其它在我身邊的好

朋友們，你們總是像燭火般，在我需要時給予我最溫暖的擁抱。

最後要謝謝我最親愛的家人，你們總是最堅強的後盾，讓我可以放心的往前走，因為我知道我只要回頭，你們永遠都張開雙臂在那裡等著我。我還想要謝謝我自己，謝謝妳願意相信自己，過去如此，未來更要如此。

瑋倩 謹誌

於台北木柵，民國 102 年春初



摘要

在政治社會化的相關研究中，影響個人政黨認同的形成，家庭社會化為一重要因素，父母親的政黨認同透過家庭之政治社會化過程傳遞給子女，使得子女通常會承襲父母親的政黨認同，與父母親擁有相近，甚至是相同的政治態度。而本研究試想從另一個角度—社會系絡，來對大學生政黨認同的建構原因進行探討，了解社會系絡對於大學生的親子政黨認同，是否產生影響，減低家庭政治社會化的效果，使其並未承襲家庭政治社會化的影響，進而發展出屬於自我的政黨認同。

就研究結果分析發現，當大學生就讀的學院為法社學院、參與社團的程度愈高時，大學生愈容易擁有與父母相異的政黨認同，顯示出社會系絡中的學校因素，其中就讀學院類別與社團參與程度確實是影響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因素之一，其亦減緩家庭中父母政治態度傳遞的影響力；就另一方面來看，父母政黨認同強度愈強、與父母愈親近、與父母討論政治事務頻率愈高、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愈高，以及政治練達程度愈高的大學生，其與父母擁有相同政黨認同的機會較高，這部份即驗證家庭社會化的研究，顯示出家庭之於大學生政黨認同的概念仍有高度的影響力。

本文僅以初探性的研究出發，期許透過本文的發現，使得相關研究學者更能注重社會系絡在政治社會化過程當中，傳遞政黨認同所扮演的角色，往後不僅只是單單注意家庭所帶來的傳遞效果，更要深入瞭解社會系絡的影響。

關鍵詞：大學生、父母、社會系絡、政治社會化、政黨認同

目次

目次	I
表目次	III
圖目次	IV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章節安排	3
第二章 理論基礎與文獻檢閱	5
第一節 社會系絡的影響	5
第二節 個人參與行為與自我態度的影響	15
第三節 政黨認同與家庭政黨認同的傳遞	22
第三章 研究設計	27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27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資料來源	32
第三節 變數的建構與測量	34
第四章 大學生與父母親政黨認同之分析	43
第一節 大學生與父母親政黨認同的分佈情形	43
第二節 父母親政黨認同與大學生政黨認同的關係	49
第三節 同質與異質父母對大學生政黨認同之影響	53
第四節 親子政黨認同之異同與大學生政黨認同的關係	58
第五節 小結	59
第五章 社會系絡與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之分析	61
第一節 學校因素與媒體因素對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的影響	61
第二節 家庭因素對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的影響	64
第三節 個人政治態度與個人背景對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的影響	66
第四節 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異同的解釋模型	69

第五節 小結	78
第六章 結論	81
第一節 研究發現	81
第二節 檢討與建議	87
參考文獻	91
附錄一 變數建構表	99



表目次

表 3-1	抽樣架構表	33
表 3-2	父母與子女政黨認同組合分類表	35
表 4-1	全國大學生及其父母、政大學生及其父母親與全國選民之政黨認同次數分配表（五分類）	45
表 4-2	全國大學生及其父母、政大學生及其父母親與全國選民之政黨認同次數分配表（三分類）	48
表 4-3	父親政黨認同與大學生政黨認同的交叉分析表	50
表 4-4	母親政黨認同與大學生政黨認同的交叉分析表	52
表 4-5	父親政黨認同與母親政黨認同的交叉分析表	54
表 4-6	同異質父母政黨認同與大學生政黨認同的交叉分析表	57
表 4-7	親子政黨認同之異同與大學生政黨認同的交叉分析表	59
表 5-1	學校因素與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一致性交叉分析表	62
表 5-2	媒體使用頻率與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一致性交叉分析表	63
表 5-3	家庭變項與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一致性交叉分析表	65
表 5-4	個人政治態度與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一致性交叉分析表	67
表 5-5	個人背景變項與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一致性交叉分析表	68
表 5-6	模型中各項量表之分數分佈表	70
表 5-7	社會系絡影響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異同之二元勝算對數模型	72

圖目次

圖 3-1 研究架構圖28



第一章 緒論

當代政治科學研究領域中，政治社會化的影響一直是長期被關注的研究領域之一。個人的政治態度，自幼即深受其父母的影響，係政治社會化的關鍵，本文欲以社會系絡的角度為出發點，檢視家庭以外，學校與大眾傳播媒介對大學生政黨認同的影響。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孔叢子·居衛》有言：「有此父斯有此子，人道之常也。」在人生的經歷當中，一個人從出生之後，最先接觸到的環境即為家庭，個人的許多價值觀念、行為，甚至是政治態度，多傳承自家庭或是受到家庭所影響。當大學生的政治態度——政黨認同，與父母親相異時，又是哪些原因造成這樣的現象，使得子女沒有承襲家庭的影響，而發展出屬於自我的政黨認同？此即為本研究想解答的問題。

本研究欲從社會系絡的角度，檢視大學生政黨認同與父母異同的原因，大致可分為三個面向：大學教學的風氣、社會議題的接觸與脫離原生家庭的變化。首先，就大學風氣而言，個人在其求學階段，經歷了小學、國中與高中職等漸進式的學習，在進入大學之前，受限於年齡與教育學習的安排，絕大多數的學生是受到較為制式、嚴謹與壓抑的學習方式與教導，而在進入大學之後，大學生所感受到最大的不同，就是學校教育方式與教育風氣的改變，在大學教育裡，多元開放的教學風氣是最主要的教學概念，除了老師在課堂上的教導之外，與同儕相處的方式、社團活動與課外活動等，都與高中職之前的學校生活有迥異的改變，這樣自由風氣的環境不再抑制學生的自我思考能力，有助於學生培養屬於自己認同的

價值觀念。

在社會議題接觸方面，當大學生進入學校之後，因為學校課程教導的關係，課堂討論氛圍亦較多元，再加上大學生即將擁有投票權以及面對就業的壓力，他們開始漸漸有更多的機會去接觸社會議題，甚至是親身去參與和議題相關的活動，這樣的經歷，也會讓大學生開始培養自己對社會議題的思考與判斷能力。

最後，就脫離原生家庭的改變，在進入大學之前，大部分的學生都是就讀住家附近的學校，為了就學而就讀外縣市的學生比率相對較低，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孩童的年齡較小，尚未具備自我獨立生活的能力，仍然需要依附家庭，所以大部分的學生，在其進入大學之前，多居住在原生家庭當中，受到家庭教育的薰陶與影響效果甚鉅。進入大學之後，因為大學的設立並非為學區制，使得有一部份的學生離開原本生活的城市，到外縣市的大學去就讀，其比例與就讀高中職前的學生高出許多，大學生離開了原生家庭的依附，開始了自我獨立的生活，如此一來，大學生有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可以投入學校與社團，與同儕相處的時間更是增加，除了少了家庭的束縛與壓抑之外，大學生在剛開始接觸多元的課外活動時，觸發了更多的興趣與注意力，而大學所給予的影響，也因為大學教育不再只是強調課業上的學習，更注重課堂之外的活動與多元興趣的培養，在這樣的環境與條件配合之下，大學生在大學裡受到大學教育環境、同儕相處、社團課外活動等社會系絡的影響，這也是除了家庭之外，大學生最密集且頻繁接觸的社會系絡。

本研究選擇大學生當作研究對象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大學生相對於中學生來說，其心智年齡較趨成熟，對於公共事務也有一定的理解力與參與力，其政治態度與政治行為的發展也較為成熟，而大學生的年齡剛好介於即將擁有或剛剛擁有投票權，其對政治態度的經驗有較直接的影響。

本文最想要探討的問題，就是以社會系絡的角度為出發點，試著控制家庭的

影響，來探討大學生政治態度的變化。藉由探究社會系絡對於大學生的影響，造成其擁有與父母親、家庭相異的自我政治態度，可以肯定社會系絡對於大學生養成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符合近年世界教育的主流風潮，即讓大學生擁有獨立批判思考、衡量主客觀的情勢以做出適宜抉擇的思考能力，並且有系統地研判問題，有效地解決問題和衝突，使學生具有問題解決、批判思考及作合理決定的能力，並藉此觸發大學生獨立思考的潛能與發展，以面對生活中各種的變動與挑戰。

第二節 章節安排

本文將研究內容分為六個章節，在本章將說明本研究的研究動機與目的；下一章理論基礎與文獻檢閱的部分，將整理相關的理論和國內外文獻，以釐清相關變項的影響；第三章研究設計將說明本研究的研究架構、研究假設、研究方法與變數的測量與建構；第四章將以簡單的次數分配表來觀察大學生與父母親的政黨認同分佈情況，以及其政黨認同傾向異同的情況；第五章將分析研究資料，以驗證所提出之假設，並且在迴歸模型中放入影響大學生政黨傾向的變數，探討大學生的政黨認同在社會系絡與家庭影響之下的變化；最後，第六章將整理本研究的研究發現與結論，並提出檢討與未來可能繼續深入探討的研究方向以供參考。



第二章 理論基礎與文獻檢閱

本章將從社會系絡的角度出發，先探討社會系絡對於政治態度的影響，接著探討個人參與行為對自我態度的影響，最後則是針對本研究的主要變數—政黨認同，分析其意涵與討論家庭代間政黨認同的傳遞。

第一節 社會系絡的影響

人類的行為深受外在環境的影響，這也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出發點。個人生活的外在環境，大可以追溯至國家、社會，小則可以聚焦至家庭、學校與小團體等。本節將先討論社會系絡的意涵，接著分析社會系絡對個人政治態度的影響。

一、社會系絡的意涵

關於社會系絡形成之理論，Donelson（1990：2765-2773）從需求滿足觀點與互動觀點來說明，人類所處社會系絡的形成是因為人類有生存、心理、資訊、人際等需求，這些需求促進了社會系絡的形成，而且在形成的過程中，人們會依據身處同一環境下，每個人相異之特質，以建立符合人們自己所期望的關係。Monroe（1975：206-261）認為人對於週遭環境與事物都會有一種感覺及知覺，並且會依據自己的感覺作出反應。隨著環境的不同，個人的知覺也會隨之改變，且在不斷互動的過程中形成相同之意見。心理學家 Mead（1934：173-178）曾指出我們是透過他人（others）的回應，才察覺到自我的意識；沒有他人，我們的自我不但無法被我們自己看見，而且也無法被理解與發揮效用。他人賦予我們事物的意義與增加其可理解性，且我們也在與他人互動的社會過程與關係中，形

成個人的意識。社會學家Cooley (1964: 383-397) 更進一步的提出鏡中自我理論 (looking-glass self)，直接地說明我們是在與他人的互動中，透過他人對自己的反應與知覺，形成對自己的看法，換句話說，他人如同是一面鏡子，我們從他人的眼中或是行為中，看到並且感受到外在社會對於自己的評價。這些研究都說明著我們是透過與他人互動的行為，來瞭解自己，並且強調社會對於影響與建構個人態度的重要性與不可或缺性。

系絡 (context) 與網絡 (network) 這兩者的概念，Johnston等學者 (2002: 219-33) 認為，社會系絡和個人政治討論的網絡同時存在於個人身上，兩者的差別在於，系絡是強加於個人身上的建構，而網絡是個人主動建構的。系絡是外在於個人而存在，可能是一種制度性的結構，也可能是個人運作其間的社會安排。網絡則是由個人自願性所建構的互動範圍，是個人自主決定，為選擇下的產物，但是仍受到社會系絡所提供的機會與限制的影響。

關於社會系絡的意涵，Emirbayer 與 Goodwin (1994: 1411-1454) 定義為一組連接著一組個體 (人、團體、事、物) 的社會關係，個體即表示節點 (node)，這些關係用連接著點的線來代表，即社會系絡。黃毅志 (2002: 111-143) 認為，社會系絡是以個人為中心點，個人與其社會環境中，各項事物關係間的連線，其整體概念即可稱為社會系絡，且社會系絡所指的是社會關係，而非社會關係所連接的個體。Lin等學者 (1981: 73-89) 則將社會系絡界定為是由直接或間接的方式來結合一群人，而進一步形成特定的人群關係。Walker等學者 (1977: 35-41) 則認為社會系絡是一套人與人之間的接觸，並且藉此接觸，個人能維持某種社會認同並獲得精神上的支持，建立相關與社會接觸的新消息。

歸納上述學者對社會系絡的定義，社會系絡指的是人與人之間接觸所形成的社會關係，個人與個人之間相互產生影響的關係，形成社會系絡的結構，其結構可解釋個人的社會行為。以下將就社會系絡影響個人政治態度變化的面向來進行探討。

二、社會系絡與政治態度

當我們開始關注選民的政治行為時，最先被提及的就是選舉活動，選舉活動是一種社會活動，其鑲嵌於社會互動的結構模式中，選舉資訊不僅靠大眾傳播媒體傳遞，也受到許多非正式的社會機制所影響，如親戚朋友間的政治討論、路上飄揚的競選旗幟等。由此可以觀察到，選舉資訊的流動不僅可以在單獨的個人身上看見，也可以在人們彼此相互連結的團體中觀察到。而且個人所處的環境，往往對其政治態度具有重要的影響。Lazarsfeld 等學者（1944：27）曾表示過：「一個人在政治上的想法，是由他所處的社會所決定的。」由此可以發現，人們政治態度的形成，與社會系絡、人際團體、甚至是個人，有很大的相關性，這些社會系絡環境的建構，一方面決定了政治資訊交換的機會，另一方面也同時建構與影響著人們的政治態度。Kinder（1998：167-197）認為，一個人所處社會環境與社會地位的重要性，不僅在於這些背景直接地影響一個人對政治的興趣、嗜好與能力，更重要的是，這些背景還將個別公民置放在一個結構內，影響他們應該暴露在哪一種的政治資訊之中。陳陸輝與耿曙（2008：87-118）表示，強調系絡效應（contextual effect）的學者，認為個人或是政治團體所處的環境，對其政治傾向，是有重要影響的。McPhee（1963：74-103）則提出個人的政治偏好是在特定的社會建構中下維持的，藉著人際互動而成形。Beck 等學者（2002）嘗試整合資訊媒介與個人或社會系絡，其認為系絡因素之所以重要，即在於資訊來源本身帶有偏差性，當選民依賴某一資訊來源時，很可能促成選民做出有利於一方，而不利於另一方的抉擇，最佳的情形是選民全面地蒐集相關的資訊，最後再做出抉擇。但是蒐集資訊具有一定成本，加上選民本身能力的限制，使得選民僅能蒐集有限的資訊。Huckfeldt 與 Sprague（1987）指出，政治是包含在社會互動結構模型中的一種社會活動，其中政治資訊不只是透過個人傳遞，也同時透過各式各樣的社會機制傳遞，顯示出政治資訊不僅藉由單一個體加工與整合，也需要透過社會結構來傳遞、接收與詮釋政治資訊。因此，政治行為可以從個人以及所屬的團體、

網絡或其他社會組成來理解，也因此，系絡環境對於個人的影響就相當重要。

另就社會系絡環境性質的異同來做探討，Mutz（2002：838-55）認為傳統社會學或社會心理學對投票行為的研究，非常注重「交叉壓力」對個人投票決定影響的問題，他認為如果選民處於與自己不同觀點的社會系絡中，會影響其政治態度，使其立場不確定，最後比較不可能採取政治行動，而且選民對於社會安定有一種責任感，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衝突發生，往往減少，甚至是放棄其政治參與。Putnam（1966：640-654）試圖從人際互動的觀點探討社會系絡如何影響選民的投票行為，發現參與社團愈多、愈積極的選民，其投票傾向愈趨於與其所居地區整體傾向一致。

以上這些研究發現，都顯示出了社會系絡、社會環境與社會互動，皆會對於個人的政治態度造成影響，個人的價值觀念也是受到社會系絡的影響所建構而成的，社會中的人們藉由次級團體來建構人際互動關係，進而影響政治意見與行為。這是本文最主要想探討與分析的概念，即從社會系絡的角度做為切入點，來觀察現在大學生的政黨認同，在家庭與社會系絡的影響之下，其政治態度與政黨認同會產生怎樣的變化。

一般來說，大學生除了家庭之外，最頻繁接觸到的社會系絡與社會環境即為學校與大眾傳播媒介。以下將從學校與大眾傳播媒介相關文獻分析，來了解這些社會機制如何建構與影響大學生的政黨認同與政治態度。

（一）、學校

學校是繼家庭之後，孩童最先接觸的社會環境。一般而言，家庭的政治社會化是隱性的、非計畫性的，而學校是屬於有計畫、有系統的進行政治社會化的正式機構。學校透過公民教育的實施，培育學生在認知、態度及行為上成為健全之公民，因此，各級學校的民主教育乃成為學生獲取有關民主政治認知及態度的重

要途徑。經由正式的課程，特別是公民課程的安排，讓學生能感覺、認知到由老師所傳遞政治社會中成年人的態度價值與角色關係等，有計畫的將民主思想、政府組織和運作及公民的權利和義務的內容傳授給學生，並且透過非正式的課程，如生活教育，讓學生學習團體生活規範、體驗團體生活的內涵及領略個人與組織之間的關係，從團體中去體驗未來的社會與政治生活，培養學生應具備的政治素養。又大學尤其注重多元化的發展，那麼無論是從學校內部所提供的學習經驗，或是學校在外部社會當中的評價與地位而言，多元的學校性質與風格都可能造就在政治態度與政治行為上迥異的學生特質，擁有截然不同的政治態度與行為。

Delli等學者（1996：395-434）認為，教育與政治參與具有正向的關連性，教育之所以能夠直接對政治參與產生正向作用的主要原因，是教育的過程培養了受教者認知的能力，進而提高了受教者接觸與吸收政治資訊的能力。Verba等學者（1995：269-276）表示學生在學校教育過程中習得了參與公共事務的相關技能並培養了傾向參與公眾事務的態度。Dawson 與 Prewitt（1977）提出學校影響學生政治態度與政治行為的兩個主要的範疇。第一個面向是正式的課堂教學，主要有正式課程、儀式性的生活與教師的言行舉止，像是公民教育課程、政治教化、升旗典禮、校園裡豎立的政治人物雕像與政治標語的張貼等，都在引導著學生的學習。第二個面向是課堂以外的非正式活動或機構，包含學校成員的社會背景組成、課外活動與政治性的組織，其中社會背景組成是指各個學生不同的社經地位、種族背景與宗教信仰等。

在公領域的活動中，像是學校環境，學生透過和其他學校成員的互動而發展自己的人格，藉由對公共事務的關心建立公民間彼此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進而奠定個人認同基礎。更進一步的在學習過程中，擁有許多討論與聆聽不同意見的機會，在這樣的自由教育風氣之下，除了學到了社會公民該有的素養之外，學生也學會如何自我獨立思考、闡述自己想法，更重要的是學會尊重不同的意見，包容社會上各種不同的歧見，如此一來，學校也培養出了未來擁有社會公民素養的學

生。以下就學校當中，學生最主要接觸的四個環境面向來做文獻分析，探究其之於學生政治態度的影響。

1、班級

Ehman (1980: 99-119) 從教室層面來分析學校的影響力，教室層面的因素包含教師、課程與學程及班級討論氣氛。就班級討論氣氛而言，涉及教學如何進行與學生如何被教導的問題。其更進一步表示，當學生能夠自由的表達意見，並且能夠公開討論具有爭議性的議題時，這樣可以被稱為是「開放性的班級氣氛」；而當上述的條件無法被滿足時，並且教師使用獨裁策略時，這樣被稱做是「封閉性的班級氣氛」。Patrick (1977) 認為，教育的效果，圍繞在師生之間各種學習的條件，可能對於學生的政治影響很大，這種隱藏性的學習課程是學生信念與態度的潛在有力因素，特別是影響學生對權威的觀感。當學生處於某種風氣當中，經由耳濡目染，會養成學生積極或消極的性格與行事風格，對於校園事務與社團事務熱衷與否，進一步就是影響其對校園以外的公共事務關注與參與的程度，另一方面也是展現其對社會公眾事務的態度。

而國內研究方面，陳義彥(1979)以教室內與教室外影響的範疇來進行探討，教室內的影響範疇採取「修習政治學相關課程」以及教師授課時的「教室氣氛」兩個變項，而教室外的影響範疇則選擇「學生參與社團活動」及「學校的權威模式」兩個變項，來探討對學生政治定向與行為模式的關係並瞭解其對政治社會化過程的影響，研究發現這四個變項與學生參與意識、涉入競選活動及政治參與有顯著的相關性。

2、就讀學院類別

關於就讀不同科系、不同學院的大學生而言，因為其在本身的興趣上與不同學院所給予不同的教育內容影響之下，對於大學生個人的政治態度應該也會造成

影響。陳義彥（1979）的研究指出，就讀不同學院的大學生，在對政府的認知、民主信念、參與意識、涉入競選活動和政治參與等方面，有顯著性的差異。大致上來說，文法商學院學生的參與意識、涉入競選活動、政治參與和政治知識等面向的態度，都比非文法商學院的學生高，其政治定向與行為模式的差異更為顯著。本研究認為就讀法社學院的學生，在生活上接觸政治事務的機會較多，對於選舉投票的概念以及政黨的政策立場也比較容易瞭解，所以認為大學生就讀不同的學院，將影響其政黨認同的形成。

3、社團活動

學校的社團活動是一群學生基於共同的興趣與理想，自動籌組並經由學校的核准所成立的，它是一種超越班級、超越科系界線的團體，利用課餘時間，一起研究與討論專門知識、技藝或休閒活動，其活動由社員參與，專業人士輔導，讓學生體驗群體生活的意義與自我作主的能力。學校社團活動是大學教育當中重要的一環，也是學生課外活動的重心。Astin（1993：117-137）認為參與的行為，代表的是大學生、學校體系及社會體系之間的一種互動關係，在學生發展上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參與愈多，所學到的知識和自我成長也愈多。而且在大學階段，隨著年齡的增長，大學生們也開始認識到某種潛意識的心理經驗會影響人們的思考與行為。李惠加（1997）更進一步表示，青少年期的學生，會藉由參加各項正當的社團活動，以增加經驗，從中了解自己某方面的興趣、才能、能力與性向。傅木龍（2000：16-20）認為，社團如同一個小型的社會，必須建立社團的規範與組織，並以民主的方式運作，才能有效經營，因此，參與社團可以體認社會的多元民主文化，學習民主的生活方式、獲得活用的知識與適應變遷的環境。何進財（2001）也認為學生社團的團體生活經驗，可以學習寬容、合作、尊重與守紀律的公民素養。透過學校社團活動的經驗，能夠有系統地影響學生政治態度的學習，並且形成其政治行為。大部分的學校除了正式課程，均設有學生社團組織與

課外活動課程，透過這些社團活動，學生可以學習到民主的政治參與、培養學生的民主價值觀。Lackey 與 Dershem (1992: 220-234) 的實證研究發現自願參與社團活動的居民大部分都增加新的知識或擴充原來的技能，而且當他們投入社團活動的程度越深時，收獲就越多。Whitmore (1993: 25-27) 從研究一個鄉村社區成人團體發現，當人們參與活動時，不管參與的結果是成功或失敗，整個團體的動力及成員的相互反應，會讓參與者從中獲益良多。所以，參與社團活動的過程即為一種學習的過程。

如此看來，參與是提供學習的一種行動和過程，並且透過不同面向及不同程度的參與，在配合當時的組織與情境就會產生不同的學習。羅寶鳳 (1996) 也認為，這種經由參與所得的學習效果可能比在組織中的正式學習成效要大的多，顯示出參與和學習之間有極密切且正向的關係。

4、同儕團體

同儕團體是指年齡與社會地位相似的人所組成的團體，由年齡或地位相仿的伙伴，基於共同的興趣與需要，自發而組成同儕團體，如玩伴、好友、同事等。Dawson 與 Prewitt (1977) 表示同儕團體藉由下列途徑來影響個人的政治定向，首先，同儕是個人獲取有關政治社會訊息與態度的重要來源，由於同儕間經常性的密切互動，同儕無疑地成為個人傳遞與評估政治知識與規範的管道，尤其是團體中的意見領袖，對於其他成員意見與態度的形成影響更是深遠，其次，同儕協助個人定位自我的社會角色，以及形成對政治世界的觀感，而個人對於政治體制的意見與態度也可能因為得到同儕的強化，而漸形穩固。Riesman (1993) 的研究顯示同儕團體已經取代父母或其他長輩，同儕的意見或行為模式已成為現代人從事社會與政治行為時重要參考指標。孩童進入青少年階段後，與同儕相處的時間日益增加，由於年齡相近、身分相若，彼此在互動的過程中相互影響，逐漸成為政治態度形成過程中的重要參照團體之一。關於同儕團體的政治社會化功能，

呂亞力(1986:112-125)表示主要並不是藉由青少年在一起討論政治相關議題，而是在其對於青少年的個性、基本人生觀的影響，這都可能間接影響其對政治的態度與觀念。從社會學觀點而言，同儕團體是影響社會化歷程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學校應重視同儕團體次級文化，善用同儕團體的學習與成長環境。

一般於探討同儕團體的政治社會化媒介角色時，大多認為同儕團體對於青少年的政治態度影響較大，即符合本研究之主要對象—大學生，加上現代學生在心理上因為營養改善而發育提早，心理上也由於接觸大眾傳播媒體機會增多而發展快速，多數學生因為身心發展成熟，而同儕的影響力也提前發酵，所以同儕的影響力更是不容輕忽。

從以上的文獻可以發現除了學校會影響大學生的政治態度之外，皆因於科技日新月異及傳統社會結構式微的結果，大眾傳播媒介在政治資訊傳遞上與政治態度的塑造上皆愈趨重要，其更成為世界各國政治傳播不可或缺的工具。接下來，本研究將試著從另一個重要的社會系絡角度—大眾傳播媒介，來探討大眾傳播媒介對於大學生政治態度形成的影響與變化。

(二)、大眾傳播媒介

Kim(1999:29-61)表示，大眾傳播媒介所傳遞的訊息，經常是人們政治討論的內容，同時也是促使他們交談的因素之一。民眾對大眾傳播媒介的接觸愈多，政治交談的頻率愈高，無論是在特定議題或非特定議題上皆是如此，因為使用傳播媒介會刺激人們的政治交談。使用大眾傳播媒介對於政治對話的品質有正面的影響，亦對政治知識的增進有幫助。隨著科技與資訊的發達，大眾傳播媒介的影響無孔不入，成為許多訊息的來源與判斷依據，在持續接觸大量資訊的影響之下，我們對於許多事務的看法、態度與行為因此受到改變，所以大眾傳播在傳播政治文化、形成共同的政治意識、改造政治文化、引導社會政治方向方面都發揮著重要作用，所以大眾傳播在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不容輕忽。大眾傳播媒介對

於孩童乃至成人的認知圖像有很大的影響，並進而影響一般人的意見。Norris (1996: 474-80) 曾經表示，大眾媒介的重要功能在於提供民眾政治社會相關資訊，而這些資訊對民眾的公民參與有正面影響。加上衛星、網路、數位科技的發展，閱聽者現在擁有更小、更分散、更多的選擇，而且可決定他們想要消費哪種資訊，有了這樣的改變，使得政治與大眾文化之間有了透氣的關係，民眾也愈來愈容易透過影像及聲音來表達他們對政治的意見。關於大眾傳播媒介影響民眾政治態度的研究，Norris (2000) 認為電視新聞與政黨的政治活動彼此之間有關聯，對於政治參與而言，其產生活化的力量，且所帶來的影音效果對個人政治學習是很重要的，當人們在接收處理電視新聞所傳播的政治資訊時，他們也同時參與了政治。以臺灣而言，大眾傳播媒體的普及性相當高，其中電視不僅對於孩童的人格發展影響甚鉅，更可提供他們社會學習的材料。

隨著科技的發達，大眾傳播媒介的樣式也愈來愈多，產生許多新型態的媒體或節目，因此除了傳統的報紙、廣播及電視外，藉由電腦透過網際網路，使其更為普及。彭芸 (2001) 認為，新媒體的傳播不同於傳統的大眾傳播媒介常常受限於物理條件、時空的限制，會阻礙了政治的運作與表達，新科技迷人之處乃在突破時空，因其傳輸的直接性，更改變與加速意見決策形成的過程。Delli Carpini (2004: 395-434) 表示網際網路是運用最廣泛的新型態大眾傳播媒介，其包含了廣播、電視、報紙的特徵，有效提供民眾參與的管道，透過網際網路，民眾能增加參與公共議題討論及研究，得到更多的資源及刺激，以及其他形式的參與方式。相對於一般傳統的大眾傳播媒介，民眾對於網際網路擁有更高的自主性與參與，民眾不但能夠吸收更多的訊息，更能表達自己的看法與意見。同時，透過網路平台發表的評論當中，往往包含了一些衝突與對立的內容，更能吸引民眾的目光。

經前述文獻可以發現，大眾傳播媒介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使民眾獲得資訊，強化討論的頻率與內容，因而間接產生教育的作用；同時新型態的傳播方式如網際

網路的出現，有別於傳統的傳播媒介，其提供民眾更多參與及選擇資訊接收等互動的機會。

從以上文獻分析，在人生發展的過程中，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社會化媒介及重點，從嬰幼年時期所接觸到的第一個社會化單位—家庭，到學齡階段所進入的另一個重要的社會化機構—學校，以及在青少年發展階段影響愈深的同儕團體與大眾傳播媒介等，都是影響政治定向發展深遠的社會化媒介，這些不同的社會化媒介也因個人性格及其所處的社會系絡之差異，而發揮著不同程度的影響力。而個人的參與行為，受個人觀念與認同的影響，而後選擇與進行其動作，簡言之，個人的思想、態度與價值觀念，從內在自我概念的角度，進而影響個人外顯的行為與選擇。所以以下將從個人政治參與的經驗、頻率、程度等行為來推論個人自我政治意向與態度的變化。

第二節 個人參與行為與自我態度的影響

本研究認為，如欲檢視社會系絡對於個人的影響，大多須從實際參與的面向來觀察，所以接下來，本文將探討個人參與行為與自我態度之間的關聯性。個人自我概念是個體發展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因為它是個體人格形成的核心，更是影響個體行為表現的決定性因素。自我概念可視為是個人對自己各方面的綜合看法，包括個人從目標與理想的追求中所獲成敗以及對自己所做的正負評價。趙曉美（2001）表示，自我概念是個人對其行為、能力、身體與個人價值感所持有的態度、判斷與價值。張春興（1992）提出自我概念是指個人對自己多方面知覺的總和，其中包括個人對自己的性格、能力、興趣的了解，個人對處理事物的經驗以及對生活目標的認識與評價等。綜合以上學者的論點，可知自我概念的形成來自個人對自我的評價，而後再透過與他人交往及互動的過程中漸漸產生。換句話說，自我概念是後天習得的，由個體在成長的過程中逐漸形成，是過去學習與

經驗累積的結果，經過與他人的互動中，所形成的一組包括個人生理、心理、道德、人格、社會等層面所組成的心理結構。因此，為自我概念下一定義：自我概念是個人對自己的看法，是個體在與社會環境互動後如何看待自己的行為、能力、身體或態度等，個體可以由此知覺、認識及評價環境，從而決定反應的方式。

由上述文獻的探討裡可以發現，個人的認同會影響其對於事物的觀點及價值觀，而這樣的觀點，進而影響態度，最後影響個人的行為，所以個人的行為，是受到個人內心態度、價值觀念與認同感所影響的，即個人內在的思想、態度、價值觀念、認同感與個人外顯所表現出來的行為、選擇與動作，彼此之間具有高度相關的關聯性。

一、學校參與經驗的影響

關於大學生的參與行為與態度面向，林義男（1990：23-44）發現大學生的課堂參與程度、課餘學習程度、課餘學習時間與教師學術性非正式往來等五項學術性參與變項和九項社會性參與變項，如社團參與程度、同儕交往等，與其學習成果皆有正相關。顯示個人參與的程度對於大學生認知發展、個人發展有顯著的解釋力，也就是說，學生的參與對於自我認知有顯著的助益。黃玉（2000：161-200）亦指出高學習投入、高同儕互動是解釋大學生心理社會發展最重要的兩個因素。除此之外，師生關係也是解釋能力、自主性及目標發展的因素。在社團參與研究方面，發現參加社團的人在所有向度的心理社會發展上顯著高於未參與的人。如此一來，顯示大學生的參與行為與其態度、知覺方面，確實具有高度的相關性，彼此相互影響著。

二、大眾傳播媒介參與經驗的影響

Scheufele（2002：46-65）在研究大眾傳播媒介使用與政治參與的關係時，認為「人際傳播」是媒介使用的重要中介變項，從大眾傳播媒介得知的資訊，再

透過人際傳播的討論，更有助於選民熱衷於從事政治活動。McLeod, Scheufele 與 Moy (1999: 315-336) 發現人際傳播對於政治參與有顯著的正相關，愈常與人們討論議題，其參與地方政治活動的頻率愈高。Eveland 與 Kwak (2005:82-108) 指出人際討論與當地公眾事務媒體使用會相互影響，人際討論會增進選民對於媒體的暴露，反之，媒體暴露增加也會使得選民經常與他人討論政治議題。相關研究發現報紙新聞的暴露能增進人際討論，進而提升選民的政治參與程度，愈常閱讀報紙新聞，則愈常與他人進行討論，最終增加選民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的頻率。Norris (1996) 的研究顯示大眾傳播媒介的使用對於選民多項的政治參與有顯著影響。Wilkins (2000) 在選後的調查研究發現，個人平日的媒介使用程度可以有效的解釋其政治參與行為。而大眾傳播媒介與政治效能感之間的關係一直是政治傳播研究當中所關注的重要核心議題之一。Pinkleton 與 Austin(1998:34-49) 討論媒介使用與政治效能感之間的關係，發現認為大眾傳播媒介愈重要的民眾，其政治效能感愈高，他們認為，這樣的結果主要是因為當民眾認為大眾傳播媒介重要時，其接觸大眾傳播媒介的頻率亦會增高。

三、家庭相處情形的影響

在社會系絡裡，不可否認的是家庭的影響力，父母的教養態度與方式，對於孩童人格發展與生活適應頗有影響，早已為教育與心理學者所重視。由於父母是孩童心目中的「重要他人」，是孩童認同的楷模，在親子之間自然且長期的接觸中，最能發揮潛移默化的功能。接下來，本研究將探討在家庭裡，什麼形式的家庭相處，會造成大學生擁有與父母相異或相同的政黨認同。

首先就與父母討論公共事務的頻率來作探討，在一般日常生活當中，最常見的政治參與行為，就屬政治討論了，政治討論不一定要是個人有意識的參與行為，只要日常生活中涉及有關公共事務的任何對話，都可以被視為是一種政治討論，將政治討論視為是個人日常生活當中隨時隨地可能會發生的一種非刻意行為，是

一種個人在生活當中很自然的討論、交換意見的行為。其亦為政治參與的一種型態，因此經常從事政治討論的人，往往具有較高的政治興趣、政治效能感與政治知識。Kenny (1994：715-728) 表示，人們參與政治討論的次數愈頻繁，其政治興趣、政治效能感與政治知識也會愈高。

而政治參與的程度亦是受到個人所處社會系絡環境性質的影響，Campbell 等學者 (1960) 認為若個人處於某種程度之衝突環境中，相較於處於一致環境中的選民，將會大幅降低其政治參與的熱忱，這樣態度上的衝突，對於選民之政治行為及個人對於選舉之涉入程度皆有影響。即代表當個人所處的社會系絡同質性愈高，個人與生活周遭成員的政治意向愈為相似，即所身處之人際關係間彼此認同度越高，則其政治參與的程度愈高；反之，Mutz (2002：838-55) 表示當個人所處的社會網絡異質性愈高，即個人與生活周遭成員間之政治意向差距愈大，人際間的歧見愈多，則其政治參與的程度愈低。

接著，就家庭環境對於孩子所造成的影響來做探討，以社會學習的角度而言，個體的學習與成長是來自於觀察學習與模仿，尤其是親身經歷或是觀察而得的經驗，最能達成學習的效果。Bandura (1971) 認為兒童模仿最多的對象，多半是具有威信和權力的人。在兒童早期，父母是子女最早接觸的人，也是主要的認同對象，因此父母本身的行為與態度，不可避免地成為子女學習的主要內容。Lane (1966：649-662) 認為社會的基本價值能夠世代相傳，政治文化得以延續，是因為父母傳遞政治價值給子女的結果，而父母親經常運用直接灌輸、提供社會環境與等認同方式，塑造其子女的政治信仰。在家庭當中，親屬間的情感具有心理依附與信任關係，在歷經長期共同生活與互動之後，政治態度容易受彼此影響。而情感親疏關係，自然反映人際關係的親密程度，其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建立在共同生活所產生的相互行為與情感交流之上，再加上一般人都渴望受到肯定與認同，故皆傾向於與自己政治意見相符的人討論與互動。而諮詢對象的親疏程度與意見同意度有高度正相關，關係愈親密的討論夥伴，彼此之間對於政治事務的共

識也愈高。

如此一來，當家庭中，與父母討論公共事務的頻率、父母的政黨認同強度或是是否與父母同住等變項，視其家庭環境概念與大學生的自我認知概念是否相同，當其所產生的同質性愈強，則大學生愈容易受家庭環境所影響，其政治意向會愈趨相近，反之，當大學生的自我認知概念與家庭環境所產生的異質性愈高，其對於大學生所產生的影響會愈小，大學生即較不受家庭環境的互動所影響，較容易接受其他社會系絡的影響，進而產生與父母相異的政黨認同。

四、其他政治態度的影響

延續前述討論個人政治態度與政治參與之間的關聯性，以下將就個人政治態度中，影響自我個人意識較為深刻的兩個變項——政治效能感與政治練達程度做探討。

(一)、政治效能感

在政治相關態度的研究當中，最常被提及的即為政治效能感，政治效能感的概念由 Campbell 等學者（1954：187-94）等人首先提出，其定義為「人們是否能認知個人的政治行動對於政治過程有所影響，或是自身具有影響的能力，並且覺得政治與社會的改變是有可能的」。政治效能感與人民對於政府、政治體系的感受直接相關，其反應出人民對政治的感受程度。政治效能感的概念並非單面向，進一步可以區分為「內在效能感（internal efficacy）與外在效能感（external efficacy）」兩個層面。吳重禮、湯京平與黃紀（1999）認為所謂內在效能感是指個人相信自己有能力理解政治事務，認知政治過程的全貌，以及參與政治活動的程度；外在效能感則為個人相信官員對於人民需求有所反應與重視的程度。陳陸輝與耿曙（2008）表示，當我們認為某人具有高程度的政治效能感，即是認為他相信政治行動不只是一種可能性，並且此政治行動也會帶來正面的影響。

Rudolph, Gangl 與 Stevens（2000：1189-1197）的研究以認知與情感面向來研究

民眾的政治涉入程度，發現個人自我政治能力認知的內在效能感，是政治涉入程度重要的心理來源。黃信豪（2006：119-158）發現，代表自我政治能力評估的內在效能感是民眾從事競選活動參與相當重要的心理基礎。連偉廷（2007）也發現，與他人討論政治的頻率對內在政治效能感有顯著影響，表示當選民頻繁地與他人討論政治議題，自然會對政治事務越了解，進而正向影響內在政治效能感。從這些研究裡可以發現個人的政治效能感與個人的政治參與行為有正向的相關性，當個人的政治參與行為愈頻繁、投入程度愈高，代表其政治效能感較高，個人也較具有自我獨立思考的能力。

（二）、政治練達程度

影響現代公民是否能在民主社會當中，適切扮演其角色的關鍵，即為政治練達程度（political sophistication）。Luskin（1987）認為，政治練達程度可用三方面來解釋：人們所接觸政治資訊的多寡、所能理解並組織這些資訊能力的高低，以及隨之而來政治參與動機的強弱程度，且相對於政治知識而言，政治知識指的是長久記憶與醞釀的政治資訊，政治練達程度則是依據政治知識而產生的具體思想與行動能力。Sniderman 等學者（1991：569-580）認為政治練達程度，指的是選民對政治密切的關注、吸取一些資訊、對於一些特定的議題立場有見解，並且了解一些訴求。Luskin（1987）指出政治練達程度是與認知有關的概念，但是政治認知是無法直接觀察的，我們無法實際去計算選民的認知程度，只能從選民的言論及行為之中進行推論。

本研究將選擇Lau 與 Erber（1985：37-64）所使用的指標，即是以選民的政治知識、政治興趣和政治參與等三個面向來測量政治練達程度，這個指標，是以比較寬廣的面向來做測量，可以全面性的涵蓋政治練達程度的內涵，相對來說，是一個比較完整而且合適的指標。徐火炎（1995：247-288）在政治練達度的測量上亦是沿用Lau 與 Erber（1985）的方法，以選民對某些議題是否有正確地認

知、對於選舉結果的關心和選舉活動的參與做為政治練達度的指標。

五、個人背景

(一)、性別

一般來說，在性別的部分，男性普遍被認為對政治較為熱衷，對政治事務較為關注並關心政治議題，對各項政治活動之涉入參與也較為關切，而女性在傳統上，則以家庭為主、對政治較不關心。Campbell等學者（1960）表示，男性選民較會認為自己擁有理解並處理複雜政治事務的能力。關於女性選民政治態度低落的原因，楊婉瑩（2007：53-94）認為一方面是男女分處於不同的社會地位，有著不同程度的社會化作用，因此造成女性無法參與政治，另一方面為女性本身不願參與政治，是由於資源條件所造成的限制，將女性侷限在家庭等私領域中，使得女性對於政治較為疏離。胡佛（1998）認為，在投票行為上，男性選民有比較明顯的目的性，因為他們覺得透過選票可以改變政府的政策。游盈隆（1993：375-392）也認為，以臺灣地區來說，男性參與政黨活動及動員的程度較深，其對於政治議題的接收更是普遍高於女性。

(二)、家庭社會經濟地位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高低，代表家庭所能提供的物質與文化環境的差異。劉清芬（2000）認為，父母教育程度愈高、有充實且富啟發性的家庭環境，自然有利於兒童或青少年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發展；而父母教育程度愈低，貧乏、僵化、缺乏文化刺激的家庭環境，有礙於批判思考的學習。陳蜜桃（1996：71-148）發現家庭社經地位影響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愈是高家庭社經地位的學生，其獨立思考能力愈佳；反之，愈是低家庭社經地位的學生，其獨立思考能力愈差。一般而言，家庭社經地位高者，父母的教育程度、價值觀念、語言互動、學習環境及所提供的物質條件等，均較低社經地位者高，相對而言，較有利於學生在學習成

就上的表現。李輝(1994:6-9)認為父母社經地位較高者，收入較豐富或穩定，並能提供學生良好的學習環境，充分發揮所長，並從中獲得成就感，因而學生較易形成良好的自我概念；反之，家庭社經地位較差的學生，父母疏於對學生充分關懷或無法讓學生發揮所長與肯定自我，則易形成不良的自我概念。陳美芬(1996)指出家庭社經地位與自我概念的確有關聯，高家庭社經地位的家庭，父母的教養方式、價值觀念皆較為民主或積極，因此對子女自我概念有正面的影響。

經上述文獻回顧，就大學生的性別與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而言，可以發現男性在政治參與的程度較女性高，相較女性低落的政治態度，男性普遍擁有政治態度，且政治興趣也較女性濃厚；而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高低，所帶來最顯著的影響即為家庭的資源豐厚與否，進而影響家庭教育的效果，包括父母的教育程度與子女的教育環境，良好的學習環境，更能提供子女建構積極且開放性的思考，除了有利於培養子女的獨立思考能力之外，更因為家庭中父母民主的教養方式，讓孩子提前在家中學習社會公民的素養，對其建構自我的政治態度有很大的幫助。

綜上所述，可以清楚的了解社會系絡對於一個人的政治態度與價值觀念養成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也可以認知個人的行為是深刻受到其內在思想、態度與價值觀念所影響，也就是說，個人外顯的行為是受到個人內在知覺所影響。如此一來，即可以發現個人政治參與的經驗、頻率、程度等行為，對於個人自我政治意向與態度，確實有正向影響。而當人們談論到政治行為時，最受關注與討論的變項即為政黨認同，以下本研究將就政黨認同的意涵與其變遷來做探討。

第三節 政黨認同與家庭政黨認同的傳遞

一、政黨認同的意涵

Campbell 等學者(1960)表示政黨認同是選民對某一個政黨的心理依附，

而此一政黨認同，並不以正式的黨籍或是穩定、持續的投票紀錄為條件。吳重禮、許文賓（2003：101-140）表示政黨認同指的是選民對於某些特定政黨所具有的支持心理與依信心態，也是對於特定政黨的歸屬感或者忠誠感，被視為是政治行為者其自我認同，在政治世界裡的一種延展與擴張。顯示了政黨認同主要是在說明個人對於政黨團體所產生的心理依附現象。

在探討選民投票行為的因素分析中，首先談及政黨認同概念，最廣為人知的即為密西根學派，其理論結構認為，政黨認同是影響選民投票行為長期且穩定的心理依附。Campbell 等學者（1960）認為政黨認同為一種心理上的認同，且其在社會化過程當中的建構，具有長期穩定的特性；政黨認同除了決定個人投票抉擇，也提供協助選民了解政治事務，更影響選民對於議題的解讀與候選人的評價。吳乃德（1999）亦認為政黨認同是測量個人對政治相關團體歸屬感的一個態度變數，且它是所有政治態度中最為穩定者。由此可見，政黨認同被視為是一種長期且穩定的認同傾向。

整體而言，政黨認同有兩個主要的特點：

（一）、自我心理的歸屬是政黨認同的中心概念

政黨認同的本質不只是觸及心理層面，也不只是個人層面的，同時它還包含群體的概念，Miller 與 Shanks（1996）更將政黨認同解讀為是一項「自我的延伸，將自我視為一個群體的一部份」。

（二）、政黨認同有很高的穩定性

Campbell(1960)認為人們的政黨認同是伴隨著長期而且強烈的情感而來的，選民一旦形成政黨認同，便會隨生命週期而增加其強度。政黨認同也可以被視為是一種持續性的決定，因為甚少受候選人和政治議題的變換而改變，所以它是穩定的。莊天憐（2000）表示，政黨認同的持續且穩定的特色，對選民而言，即表示一種長期的政黨忠誠。

綜合前述，政黨認同相對於其它政治態度偏好，它是穩定的，雖然它並非不會改變，個人也會根據一些其它因素，如新議題的產生、過去的投票經驗，或是政黨與候選人的表現等，來持續或改變他的政黨認同，但這樣改變的幅度其實不大，影響的時間也偏向短暫。整體來說，能夠準確預測選民投票行為最主要的因素還是政黨認同，Campbell（1960）曾經表示，除了受到婚姻、遷移，或更換工作等個人生活重大變遷和社會重大事件如經濟大蕭條等情況發生，才比較有機會發生政黨認同改變的情形，整體來說，政黨認同是能夠相當持續且穩定的。

以下將從文獻中進行家庭政治社會化的分析，來探討家庭之於個人政治態度、政黨認同的形成原因與情形。

二、家庭政黨認同的傳遞

家庭政黨認同的傳遞，主要的影響媒介即為家庭，這樣家庭政治態度傳遞的行為，即為家庭政治社會化。一般來說，政治社會化的傳播媒介以家庭、學校與大眾傳媒為最主要的傳遞機構，而在這些變項當中，又以家庭這個媒介最為被廣泛討論與研究。Chaffee（1972：50-99）認為，家庭幾乎是每一個小孩子從出生後就無法分離的社會機構，所以家庭對於一個人成長的重要性無可比擬。

袁頌西（1969：216-226）表示家庭是個人生命歷程中所碰到的第一個社會化機構，其早年在家庭裡所接受到政治的或與政治相關的觀點，可能會影響他一輩子。鄭宏文（2011）更進一步的闡釋，在家庭環境當中，雖然沒有正式的政治教育，但是透過家庭成員當中的互動與相處，彼此之間存在著「模仿」與「間接的政治社會化」的行為，並在家庭中產生影響力。親子之間的關係、父母對於公共事務參與的程度、家中討論政治相關事務的頻率，政治社會化的效果也在這過程中形成，父母的政治態度也會在這不知不覺的互動中傳遞給孩子。若個人接觸的政治訊息較多，則可能會對於個人的政治態度與政治行為有所影響。因為在家庭中的時間較長，尤其是在兒童時期這個階段，因為依賴的關係，造成了兒童對

於許多事務的看法，與父母親或家中長輩有相當大的一致性。藉由這樣長期耳濡目染的影響之下，孩子受到父母影響的可能性更高。

由以上研究結果可以讓我們深刻的了解到，由於個人出生之後，最先接觸到的社會環境是家庭，因此，家庭正是一個人最初的、影響最直接的政治社會化媒介。透過家庭的影響，個人的政治態度進而被建立起來，不管是經由有形的教導與溝通，或是無形中的模仿與認知，孩童在家庭生活裡，常不知不覺地接受整套價值觀規範。在孩童的世界裡，父母往往具有極大的權威，再加上孩童往往缺乏批判及思考的能力，因此，孩童從父母身上潛移默化了大量的規矩、態度與價值觀念。又大學生在成年之前，其最頻繁與密集接觸的環境就屬家庭為重，家庭之於一個人的成長歷程中，佔了很重要的地位。而接下來將更深入的探討家庭政治社會化與政黨認同的關係。

三、家庭政治社會化與政黨認同

首先，關於國外研究部分，檢視美國政治社會化與政黨認同的研究可以發現，Campbell 等學者（1960：166）指出美國人在幼年時期，即學習他們父母的政黨認同，並與父母的政黨認同相當一致。Niemi 與 Jennings（1991）認為子女會透過平時對父母的觀察與互動、相處的過程，來認知父母親的政治態度與看法，即表示，父母親的政黨認同會透過家庭社會化的過程傳遞給孩子，產生政黨認同世代傳遞的現象。Jennings 與 Markus（1984：1000-1018）研究指出，高中生對政黨認同的強度不及其父母親的，而且二十年後，仍然維持這樣的情形，對於這些高中生來說，政黨認同的形成因素不僅僅是承襲父母的觀念，更可能在成長的過程中，受到其它因素的影響，因而造成政黨認同的變化。Niemi 與 Jennings（1991：970-988）以美國密西根調查研究中心（Survey Research Center, SRC）在 1965 年對高中生及其父母所做的調查研究，之後並進行了三次的定群追蹤研究，分別為 1973 年、1982 年及 1997 年，研究中發現，當受訪者的世代處於高中階段時，父

母的政黨認同對其有極重要的影響，隨著受訪者年紀的增長，等到其二十多歲時，父母政黨認同的影響仍然存在，但是影響力有下降的趨勢，再隨著日子的增長，等到其三十多歲時，雖然父母的政黨認同影響力持續存在，但是議題偏好對受訪者的政黨認同造成更大的影響力，由此可以發現，父母親政黨認同是影響受訪者的因素之一，隨著子女的年齡增長，父母對於孩子的政黨認同影響力逐漸減少，議題立場的影響力對受訪者本身則有明顯增加的情況。

而在國內研究家庭對於政治態度影響部分，吳乃德（1999：53-85）曾經以年輕選民為研究對象，試圖分析政黨認同與家庭政治社會化傳遞之間的關係，其研究指出，就年輕世代的選民而言，不論他們支持哪一個政黨，其獲得政黨認同概念的最重要管道是家庭，透過家庭政治社會化的傳遞過程，年輕世代的選民承襲了父親的政黨認同，唯此研究是以父親對於孩子政黨認同的影響為主要分析的概念，忽略了母親在家庭中所扮演角色的影響，可能是考量到當時的社會風氣，所以僅探討父親之於政黨認同概念傳遞的影響，而現代社會風氣與政治氣氛都已不可同日而語，所以本研究將會同時探討父親與母親之於家庭政黨認同概念傳遞的影響。

由以上的研究結果可以歸納出，一個人政治態度的形成與建構，與家庭有著密切的關係，尤其是政黨認同這個重要的政治態度，在大部份的研究裡，都可以觀察出，子女與父母在政黨認同這個政治態度上，有著高度的相關性，也就是說，父母的政黨認同，會經由家庭政治社會化的過程，傳遞給子女。

第三章 研究設計

選舉相關研究當中，選民的政治態度與投票行為之間的關係有其重要的地位，其中最受關注的影響變項即為政黨認同，也是選舉研究當中，長期被關注的焦點之一。家庭政治社會化的研究亦發現，個人的政黨認同，從幼年階段開始，即深受父母的影響，而本文欲從另外一個面向——以社會系絡的角度為出發點，試著控制家庭的影響，來探討大學生政黨認同的變化，即探究個人的政黨認同在家庭社會化與社會系絡的影響之下，會產生如何的變化。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一、研究架構

在研究架構的部分，本研究欲探究社會系絡對於大學生政黨認同的影響。綜合以上國內外文獻的探討，本研究將從四大面向來探討大學生政黨認同傾向的變化，包括社會系絡、家庭、個人政治態度與個人背景，其中社會系絡的影響及其所帶來的變化，更是本研究主要想探討的面向。

在社會系絡方面，本文將以學校與大眾傳播媒介為主軸來進行研究。學校方面，欲探究的影響變項為班級、社團活動與同儕團體等因素，包括班級參與程度、班級討論氣氛、社團參與程度、與同學討論政治性議題的頻率以及就讀學院類別。而大眾傳播媒介方面，為使用媒體的頻率與關注媒體的程度。在家庭方面，欲探究的影響變項為父母政黨認同的強度、與父母討論公共事務的情形、是否住在家中，以及與父母的親疏程度。關於個人政治態度與行為方面，將探討個人的政治效能感與政治練達程度。最後，在個人背景方面，則將探討性別、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學校類別的影響。



圖 3-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二、研究假設

經由上述文獻探討與研究架構之擬訂，本文之研究假設主要是探討社會系絡對於大學生政黨認同的影響，以及其政黨認同變化情形。關於大學生的政黨認同在社會系絡及家庭政治社會化影響之下變化情形的假設，主要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學校環境與大眾傳播媒介，分別詳述如下，首先就學校環境部分：

1、大學生於學校班級參與程度愈熱烈，其政黨認同與父母相異的情況愈高。

2、大學生所處於的班級討論氣氛愈民主，其政黨認同與父母相異的情況愈高。

大學生在學校班級裡參與的程度愈頻繁、愈投入，代表大學生與社會系絡的環境互動愈密切，且班級的討論氣氛愈民主，愈容易鼓勵大學生發表自我的看法，如此一來，除了可以激盪彼此的想法與觀念之外，更可以學會尊重其他意見，養成基本的公民素養。身處民主氛圍的班級中，大學生比較容易可以經由與同學或老師這樣的互動過程中，建立或修正自我的政治態度。在這樣的互動過程中，班級參與和班級討論氣氛影響了個人的價值觀念，並經由相互討論的成長，健全大學生的自我概念，進而增進大學生獨立思考的判斷能力，甚至重新建構大學生的政治態度，使其政黨認同不受家庭社會化影響，而擁有自我認同的政治態度。所以，本研究認為，當大學生於學校班級參與程度愈熱烈，其愈容易與父母親擁有相異的政黨認同態度。

3、就讀法社學院的大學生，其政黨認同與父母相異的情況較高。

就讀法社學院學生在學校裡接觸政治相關課程的機會較多、接觸政治事務的機會亦較多。法社學院的大學生除了對於政治事務的興趣較其他學院大學生高之外，在學校環境的輔助之下，其因為接觸的頻率較高、面向較廣與內容較深入，所以本研究認為，就讀法社學院的大學生，其較容易產生自我認同的政治態度，而非受父母的家庭影響，其產生與父母相異的政黨認同情況較高。

4、大學生擁有社團參與經驗，其政黨認同與父母相異的情況高於沒有參與社團經驗的大學生。

5、大學生社團參與程度愈高，其政黨認同與父母相異的情況愈高。

社團參與經驗，對於大學生除了興趣上獲得啟發與滿足之外，在個人的政治態度與公民素質的培養之上也有一定的助益。何進財（2001）認為學生社團的團體生活經驗，可以學習寬容、合作、尊重與守紀律的公民素養。而透過學校社團活動的經驗，能夠有系統地影響學生政治態度的學習，並且形成其政治行為。而參與是提供學習的一種行動和過程，並且透過不同面向及不同程度的參與，在配合當時的組織與情境就會產生不同的學習。因此，參與社團可以體認社會多元民主，學習民主的生活方式、獲得活用的知識與適應變遷的環境，另一方面也培養大學生的公民素質，學習民主社會的態度。透過參與社團的影響，使得大學生有更多的機會可以建構與改變自我的政治態度，所以，本研究認為，擁有社團參與經驗且社團參與程度較高的大學生，較容易發展出屬於自我的政治態度與行為，亦有較大的機會擁有與父母相異的政黨認同。

6、大學生與同儕團體討論政治事務的頻率愈高，其政黨認同與父母相異的情況愈高。

與同儕團體討論政治事務的過程當中，除了可以學會尊重的民主素養之外，更可以藉由討論的互動中，激發出更多不同面向的政治想法與觀念，在這樣的環境中，可以琢磨出大學生的眼界與看事情的角度，學會從更多面向去觀察事物，擁有更多元的想法與觀念，進而培養大學生擁有自我的政治態度，所以，本研究認為，大學生透過與同儕團體討論政治事務，其頻率愈高，愈容易產生與父母相異的政黨認同。

接著，就大眾傳播媒介部分，其相關假設如下：

7、大學生使用媒體的頻率愈高，其政黨認同與父母相異的情況愈高。

8、大學生關注媒體的程度愈高，其政黨認同與父母相異的情況愈高。

藉由大眾傳播媒介的傳遞，更多政治訊息被釋放出來，刺激人們的政治交談，使得一般大眾可以更輕易的接收與了解政治事件。而民眾對大眾傳播媒介的接觸愈多，人們討論政治事務的頻率也會提高，再加上當關注大眾傳播媒介的程度愈高時，代表人們投入更多的心力與時間去獲得政治資訊。在討論與傳遞政治相關訊息的互動中，人們更有機會可以培養自我的政治態度，又大學生屬於較年輕的族群，在資訊傳播媒介的使用上，不管是熟悉度與議題的深入性，都能更有效的使用，所以，本研究認為，當大學生使用媒體的頻率愈高，其愈容易產生與父母相異的政黨認同。

而家庭政治社會化、個人政治態度與個人背景等三個面向之於大學生政黨認同的預期影響如下：

- 1、父母政黨認同強度愈強，大學生的政黨認同與父母相異的情況愈低。
- 2、與父母討論公共事務的頻率愈高，大學生的政黨認同與父母相異的情況愈低。
- 3、居住在家中的大學生，其政黨認同與父母相異的情況愈低。
- 4、與父母親疏程度愈親密的大學生，其政黨認同與父母相異的情況愈低。

在家庭環境的影響之下，當父母的政黨認同強度愈強時，代表父母對政治相關事務的關心程度也愈高。尤其在家庭教育裡，父母親對於孩子有著一定的權威，再加上長期接受同個模式的思考與討論方式，經由頻繁的討論政治事務，孩子更容易在家中承襲父母親的政治態度與政治行為。且當大學生與父母的親疏程度愈高，表示其與父母的感情愈好、親密程度愈高，再加上一般人都渴望自我的想法與觀念受到肯定與認同，故皆傾向於與自己政治意見相符的人討論與互動。如大學生平時居住的環境為家中，其接觸外在社會環境的時間與強度都較低，所受到家庭環境影響的程度自然愈高。

5、大學生政治效能感愈高，其政黨認同與父母相異的情況愈高。

6、大學生政治練達程度愈高，其政黨認同與父母相異的情況愈高。

由前述文獻可以發現，個人的政治效能感、政治練達程度與個人的政治參與行為有正向的相關性，當個人的政治參與行為愈頻繁、投入程度愈高，代表其政治效能感較高，個人也較具有自我獨立思考的能力，產生的具體思想與行動能力，也因此較不容易受到家庭的影響與傳承。

7、男性大學生，其政黨認同與父母相異的情況較高。

8、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大學生，其政黨認同與父母相異的情況較高。

9、就讀公立學校的大學生，其政黨認同與父母相異的情況較高。

普遍而言，男性對於政治相關事務較為熱衷，也較為關注並關心政治議題，對各項政治活動之涉入參與也較為關切。而當個人涉入事務的程度有差異時，涉入程度愈高者，表示其興趣較高昂，且政治參與的經驗、頻率、程度等行為，對於個人自我政治意向與態度，確實有正向影響。另外，關於家庭的社經地位與就讀學校類別的影響，高家庭社經地位與就讀公立大學學生的家庭，父母的教養方式、價值觀念皆較為民主或積極，因此對子女自我概念有正面的影響，可促進其擁有自我獨立思考的能力。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資料來源

基於前述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本研究將從現有之調查資料進行二手資料分析 (secondary data analysis)，將先進行初步次數分配、交叉分析，而後進行卡方獨立性檢定，以及使用二元勝算對數模型 (Binary Logistic Model)，以期了解社會系絡對於大學生政黨認同的影響與變化。

本研究的分析資料來源為陳陸輝之計畫案《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定群追蹤研究》，參與此計畫的學者包括陳陸輝、陳義彥、游清鑫、盛杏媛、劉嘉薇、陳光輝、俞振華、蔡佳泓、鄭夙芬、王中天、王嘉州、蒙志成。此研究的特色在於其所進行訪問的對象，為臺灣的大學生，對臺灣的大學生進行機率抽樣的調查研究，為臺灣政治社會化研究中，第一個以全臺灣的大學生為母體進行研究的計畫案。本研究採用《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定群追蹤研究》第一年之研究調查資料，即2012年進行之調查研究資料。

關於研究對象，依照教育部統計處的資料，在2011年（100學年度）我國大學（四年制、不含軍警學校）約148所，而大一學生約209,703人。在2012年的訪問中，以各校為分層單位，將全臺新生分為五個層級採用，接著以各校為第一抽出單位（Primary Sampling Unit, PSU）。然後再依據樣本大小與抽出單位機率等比例的原則（Proportional Probabilities to the Size, PPS），讓各校的新生有相同的中選機會。訪問抽樣設計以及各校的預計成功樣本數參考表3-1。

表 3-1 抽樣架構表

抽樣分層	學校 數目	新生 人數	佔新生 百分比	預估 樣本數	該層抽取 學校數	該校抽取 科系數	該系抽取 學生數	抽取數 (校*系*學生)	成功 人數
1 公立一般	27	33663	16.10%	322	5	4	16	320	264
2 私立一般	36	69560	33.20%	664	6	7	16	672	582
3 公立技職	16	18489	8.80%	176	4	3	15	180	163
4 私立技職	61	80433	38.30%	766	8	6	16	768	686
5 師範	8	7558	3.60%	72	2	3	12	72	59
合計	148	209,703	100.00%	2000	25	—	—	2012	1754

資料來源：陳陸輝(2012)·《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定群追蹤研究》。此研究於 2012.03.26(一)

至 2012.05.11(五) 進行正式訪問，成功 1,754 位大一新生。

第三節 變數的建構與測量

本節將說明變數的建構與測量，本研究之依變數（dependent variable）為大學生政黨認同與父母的異同，自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為可分為四大面向：社會系絡的影響、家庭相處的情形、個人的政治態度與個人背景。社會系絡的影響變項包括班級參與程度、班級討論氣氛、社團參與經驗、社團參與程度、與同學討論政治事務的頻率、使用媒體的頻率與關注媒體的程度，以及就讀學院類別；家庭相處情形的變項包括父母政黨認同強度、與父母討論公共事務頻率、是否住在家中以及與父母親疏程度；個人政治態度的變項包括政治效能感與政治練達程度；最後個人背景的部份，包含性別、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以及學校類別，以下將說明本研究變數的建構。相關變數測量與編碼方式，將於附錄一進行說明。

一、大學生政黨認同與父母的異同

首先，先探討本研究依變項的部份，關於大學生政黨認同與父母的異同，分別測量大學生本人、父親與母親的政黨認同傾向。接著，再將國民黨與親民黨的認同歸類為泛藍，民進黨與臺聯的認同歸類為泛綠，其他都支持或都不支持等中立選項歸類為獨立選民。最後，就大學生本人、其父親與母親的認同依其一致性做分類，共分為兩類¹，相同與相異，分類的原則主要是依據大學生的政黨認同是否有與父親或母親相同。相同表示大學生、其父親與母親三人的政黨認同概念完全相同，例如都為泛藍支持者或都為獨立選民；相異者表示大學生的政黨認同並不完全與父母相異，與其中一方相異，或與兩方相異，例如大學生本身與其母親為泛綠支持者，但其父親為泛藍支持者，甚至是與父母差異性極大，其認同不

¹因為樣本數的關係，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相同樣本與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相異樣本分佈上的懸殊，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與父親和母親完全相同的比率便佔了六成二以上，其餘不與父母政黨認同完全相同的比率佔不到三成八，因此，如果繼續加以細分的結果，造成其中與父母政黨認同高度相異的比率過低，僅有一成四的比率，使其在迴歸分析中的參數無法估計而無法探究其對親子政黨認同異同的影響，故本研究在分析上即採二分法，將其歸類為相同與相異。

與任何一方相同，例如父親與母親皆為泛綠支持者，而大學生本人為泛藍支持者或獨立選民，代表其政黨認同沒有承襲父母親的認同。相關父母與子女政黨認同組合分類如表3-2。

表 3-2 父母與子女政黨認同組合分類表

	母親	子女	分類			
父親	泛藍	泛藍	相同			
		泛藍	泛綠	相異		
		泛藍	獨立	相異		
		泛藍	泛藍	相異		
		泛藍	泛綠	相異		
		泛藍	獨立	相異		
		泛藍	泛藍	相異		
		泛藍	泛綠	相異		
		泛藍	獨立	相異		
		泛藍	泛藍	相異		
		泛藍	泛綠	相同		
		泛藍	獨立	相異		
		泛藍	泛藍	相異		
		泛藍	泛綠	相異		
		泛藍	獨立	相異		
父親	泛綠	泛藍	相異			
		泛藍	泛綠	相異		
		泛藍	獨立	相異		
		泛綠	泛藍	相異		
		泛綠	泛綠	相異		
		泛綠	獨立	相異		
		泛綠	泛藍	相異		
		泛綠	泛綠	相異		
		泛綠	獨立	相異		
		泛綠	泛藍	相異		
		泛綠	泛綠	相異		
		泛綠	獨立	相同		
		父親	獨立	泛藍	相異	
				泛藍	泛綠	相異
				泛藍	獨立	相異
泛綠	泛藍			相異		
泛綠	泛綠			相異		
泛綠	獨立			相異		
泛綠	泛藍			相異		
泛綠	泛綠			相異		
泛綠	獨立			相異		
泛綠	泛藍			相異		
泛綠	泛綠			相異		
泛綠	獨立			相同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接著，以下將說明自變數的建構，共可分為四個部分，包括社會系絡的影響、家庭相處的情形、個人政治態度與個人背景。首先就社會系絡的相關變項進行說明。

二、社會系絡的影響

(一)、班級參與程度

關於班級參與程度的變數建構，主要目的是想了解大學生班級參與的程度，以觀察班級對於大學生的影響程度。測量題目如下：

『請問您會不會加入課堂上的討論或表達意見？』

『您在班會或各種社團會議上會不會發言？』

(二)、班級討論氣氛

在班級討論氣氛方面，藉由老師在班級內的教學方式以及其所形成的班級討論氣氛，來了解班級環境對於大學生自我態度的影響。測量題目如下：

『一般來說，您的老師在課堂上會不會鼓勵學生參加討論或表達意見？』

『您的老師與學生之間會不會討論校園內的一些爭議性問題？』

『您會不會與老師討論有關政治方面的問題？』

(三)、社團參與經驗

關於社團參與經驗，本研究想了解大學生的實際社團參與經驗。測量題目如下：

『您是否曾經參加校內以關心政治與社會議題為主的社團？』

『您是否曾經參加校內的社團(政治與社會性社團、學生會及系學會除外)？』

(四)、社團參與程度

在社團參與程度方面，本研究使用三個題目，由是否擔任社團幹部、負責人以及參與決策的經驗，作為客觀測量大學生社團參與的程度。測量題目如下：

『您是否曾經擔任社團幹部或競選社團負責人（包括學生會及系學會）？』

『您認為自己在學校的社團活不活躍？』

『您是否時常參與社團的決策？』

(五)、與同學討論政治事務的頻率

關於與同學討論政治事務的頻率則是詢問大學生與同學或朋友談論政治事務以及相關公共議題等的頻率與程度，來測量大學生與同學討論政治事務的頻率。測量題目如下：

『您與同學或朋友會討論政治方面的問題嗎？』

『您從同學或朋友的談論中獲取政治訊息嗎？』

『一般而言，您會接受同學或朋友對政治事務評論的觀點嗎？』

『您與人談論政治問題時，會引用同學或朋友的觀點嗎？』

『您與同學談論政治問題時，會不會因為彼此觀點不同，而發生辯論的情形？』

(六)、使用媒體的頻率

就使用媒體頻率而言，此變項的測量方式則為詢問大學生自我主觀認定使用媒體的頻率。測量題目如下：

『您觀看電視(含該台網路新聞)新聞報導的情況是？』

『您閱讀報紙上(含該報電子報)政治新聞的情況是？』

『您閱讀網路上政治新聞(如：Yahoo新聞、Facebook、BBS等)的情況是？』

『您收聽廣播電台政治新聞的情況是？』

『您觀看電視上政論性談話節目(如:2100全民開講、大話新聞)的情況是?』

(七)、關注媒體的程度

關於關注媒體的程度，延續上題使用媒體的頻率，此變項的測量方式則為詢問大學生自我主觀認定關注媒體的程度為何。測量題目如下：

『當您觀看電視(含該台網路新聞)的新聞報導時，您的注意程度為何?』

『當您閱讀報紙(含該報電子報)的政治新聞時，您的注意程度為何?』

『當您閱讀網路上政治新聞時，您的注意程度為何?』

『當您收聽廣播電台政治新聞時，您的注意程度為何?』

『當您觀看電視上政論性談話節目時，您的注意程度為何?』

(八)、就讀學院類別

本研究將依性質將大學生於問卷封面所填寫之「受訪者之科系」來歸類其所屬學院，將之劃分歸類為法社學院(包含社會科學院、國際事務學院、傳播學院及法學院)、與非法社學院，(包含外語學院、文學院、教育學院、商學院及理學院等其它學院)。

三、家庭相處的情形

(一)、父母政黨認同強度

關於測量父母親政黨認同強度的問題，則是詢問大學生主觀認定其父母親政黨認同強弱度為何。測量題目如下：

『請問您父親是非常支持該黨，還是普普通通?』

『請問您母親是非常支持該黨，還是普普通通?』

(二)、與父母討論公共事務頻率

與父母親討論公共事務頻率方面，除了公共事務相關問題之外，另也就政治方面問題做為測量的標準。測量題目如下：

『您的父親是否與您討論與公共事務有關的問題（如社區問題、社會福利、選舉、公共政策...等）？』

『請問您會不會與父親討論有關政治方面的問題？』

『您的母親是否與您討論與公共事務有關的問題（如社區問題、社會福利、選舉、公共政策...等）？』

『請問您會不會與母親討論有關政治方面的問題？』

（三）、是否住在家中

此變項的測量題目想了解大學生現在的居住情形，是與家人同住、住學校宿舍或在外租屋？

『請問您現在是與家人同住？住學校宿舍？在外租屋？或其他？』

（四）、與父母親疏程度

關於與父母親疏程度則是以大學生主觀認知為主。測量題目如下：

『請問您和您父親的親疏程度為何？』

『那和您母親呢？』

四、個人的政治態度

（一）、政治效能感

政治效能感的測量分為內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測量題目如下：

『像我這樣的人的看法，政府官員是不會關心的。』

『像我這樣的普通老百姓，對政府的政策是沒有什麼影響力的。』

『像我這樣的人，是很難了解政治的事情。』

(二)、政治練達程度

1、政治知識

關於政治知識方面的測量，以對政治人物的認識、政治制度的認識，以及對國際事務的瞭解來做為測量的標準。測量題目如下：

『美國總統是誰？』

『請問目前立法院最大的政黨是哪一個黨？』

『我國監察委員的任命需經那個機關同意？』

『中國大陸的國家主席是誰？』

『聯合國總部設在那個城市？』

2、政治參與

就政治參與的測量，本研究採用廣義的政治參與定義，只要與公共事務相關，即可歸類為政治參與的一種。測量題目如下：

『請問您有沒有投書給報紙，來表達您對政治議題的看法？（不管有沒有被採取）』

『請問您有沒有叩應（call in）廣播或電視上的政論性節目，來表達您對政治議題的看法？（不管有沒有接通）』

『請問您有沒有在網路上表達或回應您對政治議題的看法？』

『您是否常參加或聆聽學校所舉辦的有關公共事務或社會問題的演講或座談會？』

『您是否曾經向學校提出與校務有關的意見？』

『請問您是否曾經加入或發起爭取學生權利的校園活動？』

3、政治興趣

就政治興趣而言，以關心政治事務的程度做為測量的標準。測量題目如下：

『在選舉期間，請問您會不會關心選舉的新聞？』

五、個人背景

(一)、性別

性別的部分，將分為男性及女性兩類。

(二)、家庭社會經濟地位

由於大學生多無收入，較難測量「個人」社經地位，因此本研究以「家庭」的社經地位為指標，由受訪者自行認定其家庭社經地位，問卷中依受訪者自行認定其家庭社經地位在臺灣社會狀況中的階層，分成上層、中上、中等、中下、下層。測量題目如下：

『以您所瞭解的臺灣社會狀況，請問您認為您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是屬於哪一個階層？』



第四章 大學生與父母親政黨認同之分析

本章將以簡單的次數分配表來觀察大學生與父母親的政黨認同分佈情況，以及其政黨認同異同的情況；另將與2004年陳義彥《我國大學生政治價值與態度的持續與變遷—大學四年政治社會化過程之研究》、2004年劉義周《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以及2012年朱雲漢《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三筆資料共同比較，除了比較不同年度大學生的政黨認同分佈情形，以檢視在不同社會背景與氛圍之下大學生政黨認同分佈的差異情形，更進一步的探討未有社會經歷的大學生與擁有社會經歷的一般選民之間政黨認同分佈的差異情形。本章將首先分析父親與母親的政黨認同分別與大學生政黨認同的關係，接著了解父親與母親政黨認同彼此的關連性，進一步探討父母親在交叉配對後，形成九種不同父母政黨認同的組合情形分別對大學生政黨認同之影響，最後則是分析親子政黨認同之異同與大學生政黨認同之間的關係。

第一節 大學生與父母親政黨認同的分佈情形

本節首先將觀察大學生與父母親認同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臺聯及獨立選民的分佈情形；接著將國民黨與親民黨合併成為「泛藍政黨」，將民進黨與臺聯合併成「泛綠政黨」，中立無反應選項則歸類為「獨立選民」，並觀察大學生與父母親認同泛藍政黨、泛綠政黨以及獨立選民的分佈情形。

一、大學生與雙親的政黨認同五分類之分佈

根據調查分析結果，全國大學生及其父母、政治大學學生及其父母親與全國

選民政黨認同之次數分配如表4-1 所示，表4-1 列出了五分類的大學生與父母親之政黨認同，分別檢視其認同國民黨、認同民進黨、認同親民黨、認同臺聯以及獨立選民之分佈。首先觀察2012年全國大學生，政黨認同偏向國民黨佔了38.4%，支持民進黨佔了19.6%，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學生當中，不具政黨認同的獨立選民比例最高，佔了四成左右，略高於國民黨支持者的比例，筆者認為這是由於本研究對象是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他們剛好處於邁向成年的階段，絕大部分的學生尚未取得投票權，對於政治事務的熟稔度較父母親來得低，正處於建構政治態度的年紀，因此獨立選民的比例偏高。關於父親與母親的政黨認同方面，普遍都是較為傾向國民黨，分別佔了44.2%與43.3%。就父親而言，傾向認同民進黨者次之，為28.0%，獨立選民大約佔了兩成七；就母親而言，傾向獨立選民次之，為32.9%，民進黨支持者，所佔比率將近兩成三。關於父親為獨立選民的比率較母親低的原因，筆者認為是因為一般來說，父親的政治參與及對政治事務的關切會比母親頻繁許多，因此父親具有政黨認同者的比例也就相對較高。另外，就國民黨與民進黨而言，他們吸引到的支持對象不太一樣，父親與母親認同國民黨的程度是差不多的，國民黨的支持對象以父母一代為主；民進黨支持者中，以父親這一輩的男性對它的認同最強，雖然大學生支持民進黨的程度較父母親低，不過民進黨訴求年輕化的政策與形象，甚至是行銷方式與宣傳手法，或多或少也吸引了大學生的青睞，遠勝於對親民黨與臺聯的喜愛。在大學生、父親與母親當中，支持親民黨與臺聯的比率相當低，顯示親民黨與臺聯在社會中所吸引到的政黨認同者相當有限，只能吸引少數特定選民，對於多數選民來說，是不具吸引力的。

接著觀察2012年全國大學生、父親及母親與一般選民，首先就認同國民黨的部分，全國大學生支持國民黨的比率稍低於一般選民，而父親與母親則稍微高於一般選民，整體來看，全國大學生、父親、母親與一般選民對於國民黨的支持比率沒有太大的差距，大約在五個百分點之內。關於民進黨的部分，全國大學生支持民進黨的比率與一般選民相較之下，少了約九個百分點，顯示出現在的社會氛

圍，相較於國民黨，大學生對於民進黨的信心較為低落，筆者認為可能是受到2000年至2008年，民進黨執政時的貪汙弊案所影響，而經過四年時間，大學生對民進黨的信心仍未見起色，也顯示出民進黨這四年的改革與反省未獲得大學生的青睞與肯定，父親與母親支持民進黨的比率與一般選民差不多，又父親較母親支持的比率稍高一些。就親民黨與臺聯的部分，所獲得的支持率都非常低，顯示出這兩個政黨的勢力漸漸萎縮。最後就獨立選民的部分，父親、母親與一般選民傾向無特定政黨的比率差不多，差距約在三個百分點之內，但大學生為獨立選民的比率高於一般選民將近十一個百分點，造成這樣的現象，一方面因為大學生大多從未有投票經驗，自然對於政治事務的接觸機會較少，了解的程度也較低，再加上就現在的政治情勢仍舊處於兩大政黨相互鬥爭與攻訐，使得大學生對於政治事務較無信心，因而有較高的比率不傾向特定政黨，成為獨立選民。

表 4-1 全國大學生及其父母、政大學生及其父母親與全國選民之政黨認同次數分配表（五分制）

政黨認同 傾向	2012 年				2005 年			
	大學生 (%)	父親 (%)	母親 (%)	選民 (%)	政大學生 (%)	父親 (%)	母親 (%)	選民 (%)
國民黨	38.4	44.2	43.3	39.3	34.8	41.5	42.8	25.7
民進黨	19.6	28.0	23.0	28.9	29.5	35.8	28.7	32.3
親民黨	0.7	0.8	0.8	1.0	4.6	5.2	8.1	6.8
臺 聯	0.3	0.1	0.1	0.8	1.2	1.2	1.1	1.8
獨立選民	40.9	26.9	32.9	30.0	29.9	16.3	19.3	33.4
總和	(1754)	(1754)	(1754)	(1826)	(1113)	(1113)	(1113)	(1232)

資料來源：陳義彥與陳陸輝（2004b）、劉義周（2005）、陳陸輝（2012）、朱雲漢（2012）。

說明 1：表中數值為直行百分比。（括號內數值為樣本數）

說明 2：關於新黨與建國黨的測量題目，僅在 2005 年（新黨與建國黨）與 2012 年（新黨）TEDS 中執行，且所佔比率極低，故本研究將其設為遺漏值。

接下來，比較2012年全國大學生及其父母親與2005年政治大學學生及其父母親，兩筆資料的施測時間分別為2012年4月與2005年5月，皆為大學生剛進入大學後接近一年的時間，推測兩者所受學校系絡的影響相近，故以此相比較。首先就國民黨支持率的部分，2012年全國資料與2005年政大資料，兩者支持國民的比率相當，差距並不大，差距皆在四個百分點之內。認同民進黨的部分，2012年全國資料相對於2005年政大資料，比率皆明顯下降，差距最多將近十個百分點。就以上支持國、民兩黨的支持率方面，支持民進黨的比率減少幅度較大，筆者推論其原因應為執政黨更替所造成結果，2012年執政黨為國民黨，2005年為民進黨連任後繼續取得執政權，由此可以發現人民對於政黨的信心反映在投票行為之上，但就國民黨支持率的部分，2012年與2005年差距不大，筆者認為可能是因為2005年的受訪對象為政大學生，而政治大學學生的父母背景中，多為軍公教人員，所以認同國民黨的比率自然較高，才會造成兩年的資料相較之下，差距並不大的現象。關於親民黨與臺聯，此兩政黨在2005年皆還有一定的支持率，尤其是親民黨，在2005年，甚至獲得8.1%的母親支持，顯示出當時在政治事務上，親民黨仍然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但時至今日，兩個政黨的支持率都不到百分之一，顯示出小黨漸漸式微的現象。關於獨立選民的部分，與2005年相較之下，2012年為獨立選民的比率皆大幅度的增加，差距皆在10個百分點以上，其說明了兩個現象，一為2005年的受訪對象為政大學生，政大屬於國立大學，在學校排名中亦名列前茅，其教育資源與社會背景相較於一般學生而言，會比較高一點，所以擁有特定政黨認同的機會較高，為獨立選民的機率自然較低；另一方面則從社會氛圍的角度進行探討，2012年因為全球經濟的不景氣，物價上漲的情況與高居不下的失業率，使得民眾生活痛苦指數²上升，再加上民眾認為政府施政效果不佳，進而對於政治事務失望與冷漠，有更多民眾進而無特定支持的政黨，成為了獨立選民。

² 痛苦指數 (misery index) 是美國經濟學者奧肯 (Arthur Okun) 在 1970 年代所提出的一種經濟指標，為失業率加上通貨膨脹率；之所以稱為「痛苦」指數，主要原因是高失業率和高通貨膨脹率都會讓人民日子難過，把二者相加，可以代表民生的痛苦程度，指數越高，意味痛苦程度越高。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資料顯示，2012 年臺灣一至九月的平均痛苦指數為 6.19，高於 2011 年的平均痛苦指數 (5.81)。

相較於2005年的選民，2012年選民支持國民黨的比率增加了13.6%，支持民進黨的比率減少了3.4%，筆者認為造成政黨支持率的變化，可能是執政黨更替所造成的結果，選民對於政府的信心與支持程度明顯反應在政黨認同上。親民黨與臺聯的部分，相較於2005年，2012年的支持率皆下降，顯示出在2005年時，臺灣的政治生態大致呈現兩個大黨以及兩個小黨的現象³，政黨分裂的情形明顯，泛藍政黨分裂為國民黨與親民黨，泛綠政黨分裂為民進黨與臺聯，但經過幾年的時間，小黨因為無法取得國會席次與政治資源而漸漸萎縮，甚至面臨泡沫化的隱憂。

二、大學生與雙親的政黨認同三分類之分佈

在瞭解大學生與父母親分別對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臺聯的政黨支持傾向與獨立選民的分佈後，接著將各政黨進行合併，為了突顯具有政黨認同者及獨立選民的差異以及方便比較，依據大學生及其父母親的政黨傾向，將國民黨與親民黨合併成為「泛藍政黨」，將民進黨與臺聯合併成「泛綠政黨」，獨立選民部份仍維持不變，將政黨認同合併為三分類進行比較，如表4-2 所示。

³ 兩個大黨指的是國民黨與民進黨，兩個小黨為親民黨與臺聯。

表 4-2 全國大學生及其父母、政大學生及其父母親與全國選民之政黨認同次數分配表（三分類）

政黨認同 傾向	2012 年				2005 年			
	大學生 (%)	父親 (%)	母親 (%)	選民 (%)	政大學生 (%)	父親 (%)	母親 (%)	選民 (%)
泛藍政黨	39.2	45.1	44.1	40.3	39.4	46.7	50.9	32.5
獨立選民	40.9	26.9	32.9	30.0	29.9	16.3	19.3	33.4
泛綠政黨	19.9	28.1	23.1	29.7	30.7	37.0	29.8	34.1
總和	(1754)	(1754)	(1754)	(1826)	(1113)	(1113)	(1113)	(1232)

資料來源：陳義彥與陳陸輝（2004b）、劉義周（2005）、陳陸輝（2012）、朱雲漢（2012）。

說明 1：表中數值為直行百分比。（括號內數值為樣本數）

說明 2：關於新黨與建國黨的測量題目，僅在 2005 年（新黨與建國黨）與 2012 年（新黨）TEDS 中執行，且所佔比率極低，故本研究將其設為遺漏值。

首先觀察 2012 年的數據，全國大學生偏向獨立選民認同者為最多，佔了 40.9%，其次則為泛藍政黨，為 39.2%。就父親而言，支持的首選政黨為泛藍政黨，高達 45.1%，其次則為泛綠政黨，為 28.1%。觀察母親的部份，支持的首選政黨與父親同為泛藍政黨，高達 44.1%，其次則為偏向獨立選民，為 32.9%。筆者認為這說明了泛藍政黨在父母親心中是較值得信任的，也因著這樣的高信任程度，使得泛藍政黨中的國民黨連續在最近兩屆總統大選中皆贏得選戰而掌有執政權。而泛綠政黨的部份，除了受到民進黨前期施政弊案所影響，近年也並未展現出顯著的改革效果，再加上這幾年臺聯並未獲得太多政治資源，其影響力日趨降低，使得民眾對泛綠政黨仍沒有太多的信心。值得特別注意的是，2012 年不管是大學生、父親、母親，或者是選民，獨立選民所佔的比率都在四分之一以上，甚至在全國大學生中超越三分之一，筆者認為，此現象可能因為近期經濟衰退、物價飛漲與施政表現不佳，使得民眾生活痛苦指數上升，造成民眾對於政府施政與政治失望，進而產生對政治較為冷漠的結果。

整體而言，大學生具有政黨認同的比例遜於父親。大學生傾向支持泛藍政黨以及傾向支持泛綠政黨的比例皆比父親對這兩大陣營的支持少了各六個百分點

與八個百分點左右，也因此大學生傾向成為獨立選民的比例比父親為獨立選民的比例多了約一成四。相較於母親來說，大學生傾向支持泛藍政黨與泛綠政黨的比例比母親傾向支持泛藍政黨與泛綠政黨的比例各少了約五個百分點與三個百分點。

接下來，比較2012年全國資料與2005年政大資料，在大學生與父親的部分，全國資料支持泛綠政黨的比率降低了約十個百分點，是獨立選民的比率則增加了約十一個百分點，支持泛藍政黨的比率則差不多；就母親的部分，與2005年相比，支持泛藍政黨與泛綠政黨的比率皆下降了各約六個百分點，而獨立選民的比率則增加了約十二個百分點。最後，將2012年選民資料與2005年選民相比較，2012年的選民支持泛藍政黨的比率增加近八個百分點，而獨立選民與支持泛綠政黨的比率則降低了約了三至四個百分點，筆者認為造成這樣的結果，應該是因為兩個年度擁有執政權的政黨更替的關係，再加上國民黨與民進黨各是泛藍政黨與泛綠政黨裡較具影響力的大黨，連帶影響民眾對泛藍政黨與泛綠政黨的支持程度。

第二節 父母親政黨認同與大學生政黨認同的關係

在探究影響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一致性與否的變化之前，筆者欲先行瞭解父親與母親的政黨認同與大學生政黨認同間的關係，為了簡化分析，本節以下將皆以政黨認同的三分類來進行本文之討論。

一、父親與大學生政黨認同的關係

以往研究顯示，父親與子女間的政黨認同是有其關聯性的。表4-3 為父親政黨認同與大學生政黨認同間的關係。在卡方獨立性檢定中，達到顯著程度。若進一步以Kendall's τ_b 來顯示這兩個變數之間的關係， $\tau_b=0.518$ ，亦達到顯著程度，

表示父親的政黨傾向與大學生的政黨傾向的確有很高的關聯性。觀察表4-3 可知，當父親傾向認同泛藍政黨時，其大學生子女與父親同樣傾向認同泛藍政黨的比例高達72.3%；而當父親為獨立選民時，將近有八成的大學生子女亦傾向無特定政黨認同；當父親支持泛綠政黨時，大學生子女政黨認同偏向泛綠政黨的比例為57.6%，以上三種情形的百分比都有偏高的現象，由此可見大學生的政黨認同與父親的政黨認同的確有高度相關，而其中泛綠政黨的對於子女的傳遞效果較差，筆者初步認為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大部分泛綠支持者的教育程度與社會經濟地位通常較低，在這樣的背景影響之下，父母親對於子女在家庭當中的教育效果較不顯著，使得父母親傳遞政治態度給子女的情形較少，此亦提供給相關研究者，可作進一步的探究。另外，從整體的比例看來，以父親支持泛藍政黨且大學生也支持泛藍政黨的比例最高，約佔全體的三分之一；其次為父親為獨立選民時，大學生也傾向成為獨立選民的情況，佔了21.4%；接著是父親支持泛綠政黨且大學生子女也支持泛綠政黨的情形，也有一成八的比例。將三者予以加總可以發現，父親政黨認同與大學生一致的比例很高，佔了七成二，只有不到三成左右的大學生與其父親政黨認同不一致。由此可以發現大學生的政黨認同，受到家庭的影響極為深刻，佐證家庭確實為政治社會化中一個重要的媒介。

表 4-3 父親政黨認同與大學生政黨認同的交叉分析表

政黨認同傾向	大學生			總和
	泛藍政黨	獨立選民	泛綠政黨	
泛藍政黨	72.3 / 32.6 (571)	23.8 / 10.7 (188)	3.9 / 1.8 (31)	100.0 / 45.0 (790)
父親 獨立選民	13.0 / 3.5 (61)	79.6 / 21.4 (375)	7.4 / 2.0 (35)	100.0 / 26.9 (471)
泛綠政黨	11.2 / 3.1 (55)	31.2 / 8.8 (154)	57.6 / 18.2 (284)	100.0 / 28.1 (493)
總和	39.2 / 39.2 (687)	40.9 / 40.9 (717)	20.0 / 20.0 (350)	100.0 / 100.0 (1754)
統計檢定	卡方值(χ^2)=1132.062，自由度(df=4)， $p<0.001$ (雙尾檢定)			
	Kendall's $\tau_b = 0.518$ ， $p<0.001$ (雙尾檢定)			
	父子政黨認同一致的比率為 72.2%。			

資料來源：陳陸輝 (2012)，《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定群追蹤研究》。

說明：表中數值為橫列百分比/全體百分比。(括號內數值為樣本數)

接著探討大學生與其父親政黨認同相異的情況。當父親無明確政黨傾向時，大學生傾向泛藍或泛綠政黨的比例都偏低，筆者認為這是因為當父親不具有政黨認同時，其在傳遞特定政黨認同給子女的效果較弱，子女容易受到父親的影響，也成為獨立選民。而當父親具有明確的政黨認同，亦即傾向支持泛藍政黨或泛綠政黨時，大學生成為獨立選民的比例約為兩至三成，這表示當父親具有政黨認同時，大學生比較不容易成為獨立選民。最後，當父親支持泛藍政黨時，大學生卻支持泛綠政黨，以及當父親支持泛綠政黨，大學生轉而支持泛藍政黨，所佔的比率非常低，只有大約百分之二或三個百分點，這證實了多數大學生子女會傾向選擇與父親的政黨認同採取一致的態度，僅有少數大學生子女會與父親的政黨認同傾向相對立。整體看來，父親與大學生的政黨認同傾向是有高度相關性的。

二、母親與大學生政黨認同的關係

接著觀察母親政黨認同與大學生子女政黨認同之間的關係。在卡方獨立性檢定中，達到顯著程度。以Kendall's τ_b 顯示這兩個變數， $\tau_b=0.549$ ，達到顯著程度，表示母親的政黨認同與大學生的認同傾向有很高的關聯性。就表4-4 看來，母親支持泛藍政黨時，大學生傾向認同泛藍政黨的比例為74.4%；母親為獨立選民，大學生傾向無政黨認同者的比例超過四分之三；當母親支持泛綠政黨時，大學生的政黨認同偏向泛綠政黨的比例為65.9%，且以上三種情形的比率皆是偏高的。由此可見，大學生與母親的政黨認同關聯性頗強。另外，從整體的比例看來，以母親支持泛藍政黨且大學生也支持泛藍政黨的比例最高，約為全體比率的三成三；其次為當母親為獨立選民時，大學生也是獨立選民的情況，佔了四分之一，接著是母親支持泛綠政黨且大學生子女也支持泛綠政黨的情形，約為一成五的比例。以上三種情形予以加總可以發現，與母親政黨認同一致的大學生比例相當高，達七成三，只有不到兩成七的大學生與母親的政黨認同不一致。與上述論述相同，

可以佐證政治社會化中，家庭為影響子女政治態度一重要的媒介，父母親的政治態度藉由家庭教育的過程傳遞給子女。

接著探討大學生與其母親政黨認同相異的情況。當母親為獨立選民時，大學生傾向支持泛藍政黨或泛綠政黨的比例分別為13.5%與9.0%；當母親傾向支持泛藍政黨或泛綠政黨時，大學生成為獨立選民的比例約為兩成至兩成五，比率亦偏低。最後，當母親支持泛藍政黨時，大學生反倒支持泛綠政黨，與母親支持泛綠政黨，大學生卻轉而支持泛藍政黨者的比例皆很低，各不到二個百分點，這顯示多數大學生子女並不會選擇與母親相異的政黨認同而支持政治光譜線另一端的政黨。整體看來，母親與大學生的政黨認同之間有極密切的關係。

表 4-4 母親政黨認同與大學生政黨認同的交叉分析表

政黨認同傾向	大學生			總和
	泛藍政黨	獨立選民	泛綠政黨	
母親 泛藍政黨	74.4 / 32.7 (574)	21.8 / 9.6 (198)	3.9 / 1.7 (30)	100.0 / 44.0 (772)
母親 獨立選民	13.5 / 4.4 (78)	77.5 / 25.5 (447)	9.0 / 3.0 (52)	100.0 / 32.9 (577)
母親 泛綠政黨	8.6 / 2.0 (35)	25.4 / 5.9 (103)	65.9 / 15.2 (267)	100.0 / 23.1 (405)
總和	39.2 / 39.2 (687)	40.9 / 40.9 (718)	19.9 / 19.9 (349)	100.0 / 100.0 (1754)
統計檢定	卡方值(χ^2)=1283.588，自由度(df=4)， $p<0.001$ (雙尾檢定)			
	Kendall's τ_b =0.549， $p<0.001$ (雙尾檢定)			
	母子政黨認同一致的比率為 73.4%。			

資料來源：陳陸輝 (2012)，《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定群追蹤研究》。

說明：表中數值為橫列百分比/全體百分比。(括號內數值為樣本數)

綜觀上述分析發現，父親與母親的政黨認同與大學生子女的政黨認同皆有高度的相關性。當父母親具有特定政黨認同時，大學生大都會與父母親的政黨傾向一致，延續父母的政黨認同，而與父母親政黨認同背道而馳的大學生不多。當父母親為獨立選民時，大學生與父母親同樣會成為獨立選民的機會也相當高，將近八成。由此可以佐證政治社會化的研究，家庭正是一個人影響最直接的政治社會化媒介，個人的政治態度透過家庭的影響，不管是經由有形的教導與溝通，或是

無形中的模仿與認知，進而被建立起來。本節先分別論述父親與母親角色對大學生政黨認同傾向的影響。下節將繼續討論在父親與母親的政黨認同傾向經過分類之後，形成九種不同組合型態之父母政黨傾向，將分別對大學生子女的政黨認同造成什麼樣不同的影響。

第三節 同質與異質父母對大學生政黨認同之影響

本節將觀察父親與母親的政黨態度之組合類型對大學生政黨認同的影響，因為子女並非只觀察父親或母親單方面的政黨認同，通常會是對父母親雙方同時間的觀察比較。本節將先探討父親與母親政黨認同之相關性，接著再依父親與母親之政黨認同區分為九大類，再與大學生之政黨認同作交叉分析比較，探究同質和異質父母與大學生政黨認同之關聯性。

一、父親與母親政黨認同之關係

就過去的研究顯示，父親及母親之間的政黨認同會具有某種程度的相關性。表 4-5 將父親與母親的政黨認同作交叉配對後的關係分佈。在卡方獨立性檢定中，達到顯著程度。Kendall's τ_b 為0.672，達到顯著程度，表示父親的政黨認同與母親的政黨認同，事實上也有著相當高的關聯性。

表4-5 的數據顯示，在一個家庭當中，父親與母親都支持泛藍政黨的比例最高，佔了36.9%，其次為一個家庭中父親與母親皆為獨立選民，也佔了23.3%，而父親與母親皆支持泛綠政黨的家庭，則佔有18.8%，以上三類家庭總共佔了79.0%，這也就表示，同質性父母的家庭在臺灣的比例相當高，佔了將近八成的比例，其餘大約兩成才是異質性家庭的組合。藉此比較父母政黨認同一致性與親子政黨認同一致性，表4-3 發現父親與子女政黨認同一致的比率為七成二，表4-4 可以

看出母親與子女政黨認同相同的比率為七成三，由表4-5 更可以發現在臺灣，接近五分之四的家庭，父親與母親擁有相同的政黨認同，如此一來，即可說明因為在臺灣家庭中，父親與母親的政黨認同之間擁有高度的相似性，造成家庭政治態度傳遞的效果極佳，使得約有四分之三的子受到父母親的影響，擁有與父母親相同的政黨認同。

表 4-5 父親政黨認同與母親政黨認同的交叉分析表

政黨認同傾向	父親			總和
	泛藍政黨	獨立選民	泛綠政黨	
母親 泛藍政黨	83.7 / 36.9 (646)	5.2 / 2.3 (40)	11.1 / 4.9 (86)	100.0 / 44.0 (772)
母親 獨立選民	16.3 / 5.4 (94)	70.5 / 23.3 (406)	13.2 / 4.3 (77)	100.0 / 32.9 (577)
母親 泛綠政黨	12.3 / 2.9 (50)	6.2 / 1.4 (25)	81.5 / 18.8 (330)	100.0 / 23.1 (405)
總和	45.1 / 45.1 (790)	26.9 / 26.9 (471)	28.1 / 28.1 (493)	100.0 / 100.0 (1754)
統計檢定	卡方值(χ^2)=1600.719, 自由度(df=4), $p < 0.001$ (雙尾檢定)			
	Kendall's $\tau_b = 0.672$, $p < 0.001$ (雙尾檢定)			
	父母親政黨認同一致的比率為 79.0%。			

資料來源：陳陸輝 (2012), 《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定群追蹤研究》。

說明：表中數值為橫列百分比/全體百分比。(括號內數值為樣本數)

異質性家庭中，以非對立型家庭比例略高，約佔13.4%的比率，在非對立型家庭中，又分為父強母弱以及父弱母強兩種家庭型態，其中父強母弱的情形指的是父親擁有特定政黨認同，而母親無特定政黨傾向，為獨立選民。包括父親支持泛藍政黨而母親為獨立選民，以及父親支持泛綠政黨而母親為獨立選民，分別佔了5.4%及4.3%，共計9.7%；父弱母強的情形包括父親為獨立選民而母親支持泛藍政黨，比例為2.3%，以及父親為獨立選民而母親支持泛綠政黨，比例為1.4%，共計3.7%。對立型家庭的部份，父親支持泛藍政黨而母親支持泛綠政黨的情形佔了2.9%；父親支持泛綠政黨而母親支持泛藍政黨的情況則為4.9%，整體而言，對立型家庭佔了7.8%。整體數據看來，非對立型家庭13.4%高於對立型家庭的7.8%。而異質性家庭中比例較高的是父親支持泛藍政黨而母親偏向中立選民的情形，

比例最低的是母親支持泛綠政黨而父親偏向獨立選民的情形，筆者認為這是因為在一般家庭當中，父親多為政治事務的領導者，因此父親不具有政黨認同而母親卻具政黨傾向的情況是比較少見的。

研究發現同質性家庭的比例遠大於異質性家庭的比例，筆者認為這與父母親的婚姻關係密不可分，婚姻關係是讓一個人持續或轉變政治態度的轉捩點，婚姻亦強化了夫妻兩人之間的互動與互賴，這些婚後夫妻兩人相互社會化的過程都是導致同質性家庭遠多於異質性家庭的原因，且本次受訪者為適逢成年的大學生，也代表其父母親已共同生活、相處至少18年以上，更容易產生共同的價值觀念與態度。

二、同異質父母政黨認同與大學生政黨認同的關係

關於父母親之間政黨認同的一致性與否，與大學生的政黨認同有什麼樣的關係，初步觀察表4-6 發現，在卡方獨立性檢定中，達到顯著程度。表示父母親的政黨認同是否一致與大學生的政黨認同，的確是有其關聯性的。

在同質性家庭中，當父母親都支持泛藍政黨時，大學生也傾向支持泛藍政黨的比例將近五分之四，較於其它組比率是偏高的，大學生支持泛綠政黨與成為獨立選民的比例皆偏低，分別為1.7%與19.0%；當父母親都支持泛綠政黨時，大學生大多傾向支持泛綠政黨，支持泛藍政黨與成為獨立選民的比例皆偏低，分別為3.3%與24.2%；當父母親皆為獨立選民時，大學生成為獨立選民的比例更高達八成五，而大學生支持泛藍政黨與泛綠政黨的比例偏低，分別為9.6%與5.4%。父母具有政黨認同時，與大學生政黨傾向間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由此可見，同質性父母與子女間的政黨認同有很高的相關性，特別是當父母親皆為獨立選民時，與子女之間的一致性更是高達八成五，大學生多對政黨採取較保留的態度而成為獨立選民，因此具有政黨認同者的比例是偏低的。接下來，觀察同質性家庭中，父母與子女政黨認同相同的比率，當父母親皆傾向泛藍政黨時，子女亦傾向泛藍

政黨的比率為79.3%；當父母皆為獨立選民時，子女傾向無特定政黨認同的比率為85.0%；當父母皆為泛綠政黨支持者時，子女亦支持泛綠政黨的比率為72.4%，觀察此三類父母的政黨認同傳遞效果可以發現，為獨立選民的父母親在親子政治態度之間傳遞效果最佳，泛藍政黨次之。筆者認為會造成這樣的現象，在獨立選民的部分，一方面是因為當父母親為獨立選民時，其提供給子女選擇與思考的空間較大，不會特意傳遞特定的政治傾向給子女，另一方面可能是因為大學生對於政治事務的不了解，成為獨立選民的比率本來就偏高。而關於父母為泛綠政黨的傳遞效果，筆者認為其傳遞效果較差，可能是因為在泛綠政黨的支持者中，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民眾比率較高，如此一來，可以推論其父母對於子女的教育效果較差，影響力較小，故泛綠政黨的家庭政治社會化效果較差。

對立型的異質性家庭，只有兩種組合模式，也就是父親支持泛藍政黨而母親支持泛綠政黨以及父親支持泛綠政黨而母親支持泛藍政黨的情形。我們可以由表4-6來探討當父親與母親的政黨認同呈現對立狀態時，與大學生政黨認同的相關性。當父親支持泛藍政黨而母親支持泛綠政黨時，有四成四的大學生會與父親政黨認同一致而支持泛藍政黨，30.0%的大學生會與母親政黨認同一致而支持泛綠政黨，另外，也有26.0%的大學生與父親及母親的政黨認同不一致而成為獨立選民；當父親支持泛綠政黨而母親支持泛藍政黨時，與父親同樣支持泛綠政黨的大學生佔23.0%，與母親同樣支持泛藍政黨的大學生佔47.1%，大學生較為認同母親之政黨傾向，而與父母親政黨認同不一致並傾向成為獨立選民的大學生亦佔了29.9%。研究發現，當父親支持泛藍政黨而母親支持泛綠政黨時，或當父親支持泛綠政黨母親支持泛藍政黨時，傾向泛藍政黨的大學生比例為最多，由此可以發現，在對立型家庭中，影響大學生政黨認同似乎沒有明顯的數據顯示是受到父親或母親的影響，而是偏向泛藍政黨，筆者推論此現象可能是受到泛藍政黨中影響力較大的國民黨擁有執政權所影響，大學生對於泛藍政黨擁有較高的信心，故傾向泛藍政黨。

表 4-6 同異質父母政黨認同與大學生政黨認同的交叉分析表

同異質父母之 政黨認同	大學生			總 和
	泛藍政黨	獨立選民	泛綠政黨	
同質性家庭				
父藍母藍	79.3 (513)	19.0 (123)	1.7 (11)	100.0 (647)
父獨母獨	9.6 (39)	85.0 (346)	5.4 (22)	100.0 (407)
父綠母綠	3.3 (11)	24.2 (80)	72.4 (239)	100.0 (330)
異質性家庭				
(對立型)				
父藍母綠	44.0 (22)	26.0 (13)	30.0 (15)	100.0 (50)
父綠母藍	47.1 (41)	29.9 (26)	23.0 (20)	100.0 (87)
(非對立型)				
父藍母獨	38.9 (37)	55.8 (53)	5.3 (5)	100.0 (95)
父綠母獨	3.9 (3)	62.3 (48)	33.8 (26)	100.0 (77)
父獨母藍	52.5 (21)	47.5 (19)	0.0 (0)	100.0 (40)
父獨母綠	8.0 (2)	40.0 (10)	52.0 (13)	100.0 (25)
總 和	39.2 (689)	40.8 (718)	20.0 (351)	100.0 (1758)
統計檢定	卡方值(χ^2)=1458.260, 自由度(df=16), $p<0.001$ (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陳陸輝（2012），《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定群追蹤研究》。

說 明：表中數值為橫列百分比。（括號內數值為樣本數）

接著討論非對立型家庭的情況，在父強母弱的情形中，當父親支持泛藍政黨而母親為獨立選民時，大學生偏向支持泛藍政黨的比例為38.9%，傾向成為獨立選民的比例超過五成五，傾向支持泛綠政黨的比例偏低，為5.3%，顯示大學生較為傾向母親的政黨傾向；當父親支持泛綠政黨而母親為獨立選民時，大學生支持泛綠政黨約佔全體比例的三分之一，傾向成為獨立選民的比例較高，為62.3%，傾向支持泛藍政黨的比例為3.9%，在這種情形中，大學生較為偏向母親的政黨認同；在父弱母強的情形中，當父親為獨立選民而母親支持泛藍政黨時，大學生偏向支持泛藍政黨的比例為52.5%，傾向成為獨立選民的比例為47.5%，則沒有大學生傾向支持泛綠政黨，這應該是樣本數太少所導致；最後，當父親為獨立選

民而母親支持泛綠政黨時，有五成二的大學生支持泛綠政黨，其比例偏高，四成傾向成為獨立選民，另外則有8.0%的大學生傾向支持泛藍政黨。我們可以發現在非對立型異質性家庭裡，大學生較傾向母親政黨認同的趨勢。相較於同質性父母的家庭，非對立型異質性家庭對子女政黨傾向的影響仍然是比較小。

整體而言，大學生子女大致上都是偏向母親的政黨認同，僅有當父親支持泛藍政黨而母親為支持泛綠政黨的情形是例外。所以，從研究結果可以推論，父親在政黨認同的傳遞上並未享有明確的支配及影響，男性政治優勢的比例愈來愈小，而母親則傾向扮演教育子女政治態度及政治行為的角色。當父親與母親都具有政黨認同傾向且傾向相異時，子女較有可能去採納母親的政治定向，有政黨傾向的母親對於下一代的政黨認同概念，具有顯著性的影響。這也顯示以往父親對於政黨認同的權威已不復存在，漸漸取而代之的是母親對子女的教養以及政治灌輸。

第四節 親子政黨認同之異同與大學生政黨認同的關係

關於父親、母親與大學生，三者之間的親子政黨認同之異同，與大學生的政黨認同有什麼樣的關係，初步觀察表4-7 發現，在卡方獨立性檢定中，達到顯著程度。表示親子政黨認同之異同與大學生的政黨認同的確是有其關聯性的。

關於親子政黨認同之異同，觀察表4-7 發現，親子政黨認同一致者高達六成二，親子政黨認同相異者，佔了37.4%，由此可以發現，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家庭影響子女的政黨認同極為深刻，高達六成二的子女與父母具有相同的政黨認同傾向，只有不到四成的大學生與父母具有相異的政黨認同。

繼續觀察表4-7 可以發現，當親子政黨認同相同時，大學生傾向認同泛藍政黨的比例佔了46.7%；而當親子政黨認同相異時，大學生是獨立選民的比率為56.6%。另外，從整體的比例看來，以親子政黨認同相同且大學生傾向泛藍政黨的比

例最高，為29.2%；其次為親子政黨認同相異，大學生為獨立選民的情況，佔了21.2%；接著是親子政黨認同相同，大學生為獨立選民的情形，佔了19.7%。由此可以初步觀察出，親子政黨認同傾向一致的比率很高，且大學生多偏向泛藍政黨。當親子政黨認同相異時，大學生較不容易傾向於特定政黨認同，進而成為獨立選民。

表 4-7 親子政黨認同之異同與大學生政黨認同的交叉分析表

政黨認同 之異同	大學生			總和
	泛藍政黨	獨立選民	泛綠政黨	
相 同	46.7/ 29.2 (513)	31.5/ 19.7 (346)	21.8/ 13.6 (239)	100.0/ 62.6 (1098)
相 異	26.5/ 9.9 (174)	56.6/ 21.2 (371)	16.9/ 6.3 (111)	100.0/ 37.4 (656)
總 和	39.2/ 39.2 (687)	40.9/ 40.9 (717)	20.0/ 20.0 (350)	100.0/ 100.0 (1754)
統計檢定	卡方值(χ^2)=110.604，自由度(df=2)， $p<0.001$ (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陳陸輝（2012），《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定群追蹤研究》。

說 明：表中數值為橫列百分比/全體百分比。（括號內數值為樣本數）

最後探討親子政黨認同相異的情況，當親子政黨認同傾向相異時，大學生傾向泛藍或泛綠政黨的比例都偏低，各佔了26.5%與16.9%，大學生成為獨立選民的比例約為五成六，筆者認為這是因為當親子間對於政黨認同沒有共識時，降低了父母之於特定政黨認同傳遞的效果，造成政黨認同在傳遞上的效果較弱，因此大學生具有政黨認同的比例不高，有很大的機會成為獨立選民。

第五節 小結

從本章次數分配的初步分析中，我們分別觀察大學生與其父母親政黨認同傾向的分佈情形，從政黨認同的三分類來討論時，發現大學生以沒有偏向特定政黨的獨立選民比率最高，筆者認為造成大學生以獨立選民為大多數的情況，原因應

該是因為這群大一學生剛從高中畢業，對政治事務仍然不太瞭解，也缺乏相關的政治經驗，因此具有政黨認同者的比例自然偏低。這樣的現象也令人擔憂，如果現在大學生對於政治事務冷漠，獨立選民比率極高，而未來當這些大學生成為社會當中主要的成員之後，對於公共事務的態度是否仍然消極、參與程度低落？此將為未來公民社會的隱憂。關於父母親支持的首選政黨皆以泛藍政黨為主，父親的部份其次為泛綠政黨，母親的部份以獨立選民者次之，筆者認為此現象可能說明了男性的個性與注重泛綠政黨的改革精神較為相符，而女性則較傾向泛藍政黨的安定感及穩定性。另外，關於父親與母親政黨認同傾向對大學生政黨認同傾向的影響，本研究發現，大學生分別與父親及母親的政黨認同都有很高的相關性，有七成二以上的大學生與父親的政黨認同一致，也有至少七成三以上的大學生與母親的政黨認同一致。接著，本文針對父親與母親的政黨認同異同進行分析，發現，同質性父母佔了七成九以上的高比例，這應該是受到婚姻的影響；其次，當父母親呈現同質性政黨認同時，其與大學生之間政黨認同傾向的一致性是遠大於異質性父母的；在異質性家庭中，大學生子女的政黨傾向大致上都是較為偏向母親的，顯示出以往父親支配政黨認同的權威也已不復存在，漸漸取而代之的是母親對子女的教養以及政治灌輸。最後，本文觀察親子政黨認同之異同與大學生政黨認同之間的關係，當親子政黨傾向認同相同時，大學生大多傾向認同泛藍政黨；當親子政黨認同相異時，大學生成為獨立選民的比例較高，筆者認為這是因為當親子間對於政黨認同沒有共識時，降低了父母之於特定政黨認同傳遞的效果，使得大學生較容易成為獨立選民。

本章先簡單的統計分析來觀察父親、母親之政黨認同、父母親之政黨認同交叉組合和大學生政黨傾向的關係，並進一步了解親子政黨認同之異同與大學生政黨認同之間的關係，在此過程中並未控制其它變數，因此，在下一章中，筆者將透過模型的建立，找出影響親子政黨認同一致與否的變數。

第五章 社會系絡與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之分析

為了更進一步探究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的異同是否受到社會系絡的影響，本章前三個小節將先觀察學校因素、媒體因素、家庭因素以及大學生個人政治態度與個人背景分別與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傾向之間的關係，再以統計模型來探討影響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異同的因素。

第一節 學校因素與媒體因素對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的影響

本節主要在探討學校中的各類因素與媒體關注變項對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之異同的影響。關於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的分類，採用與父母相同或相異兩個面向來探討。關於學校方面的影響因素，筆者選取大學生班級參與程度、班級討論氣氛、所屬學院類別和社團參與經驗等變數來觀察其與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的關係。媒體關注變項方面，則選取使用媒體頻率，試圖釐清媒體對於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之異同的影響。

一、學校因素對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的影響

學校是一個影響大學生政黨傾向不可或缺的社會化機構。表5-1 為探討大學生所屬學院類別、班級參與程度、班級討論氣氛以及社團參與經驗等學校因素與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之間關係的交叉分析。

從表5-1 可以發現大學生所屬的學院類別與其親子政黨認同之異同，在卡方獨立性檢定中達到顯著程度($p < 0.01$)，就讀法社學院的大學生其政黨認同與父母

相異的比率為47.4%，與父母相同的比率為52.6%。整體看來，法社學院的大學生與非法社學院的大學生相較之下，其政黨認同與父母相異的比率較高，相差了約十一個百分點。筆者認為這是由於就讀法社學院的大學生除了本身對於公共事務較有興趣之外，其亦較容易接觸到政治相關資訊的薰陶以及法律相關知識，也有更多的機會可以了解社會上的公共事務，甚至是親身去參與，因著學校所提供的教育環境與學習氛圍，得以幫助塑造形成其個人獨立思考與判斷的能力，並且對於政治相關事務有更多的了解，進而擁有自我面對政治事務的態度，因此產生自我的政治思考，擁有與父母相異的政黨認同。其他非法社學院大學生擁有與父母相同的政黨認同比例較高，則可能是因為其本身對於公共事務較不感興趣、較不願意付出時間去了解，更在課堂上或生活上較法社學院的學生少有機會接觸到政治事務使然，使得其不容易擁有自我對於政治事務的獨立思考，容易受父母影響，進而與父母擁有相同的政黨認同傾向。

表 5-1 學校因素與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一致性交叉分析表

	政黨認同一致性			統計檢定
	相異	相同	(樣本數)	
總和	37.4	62.6	(1754)	
學院類別				
法社學院	47.4	52.6	(171)	卡方值=8.041 自由度=1
非法社學院	36.3	63.7	(1583)	$p < 0.01$
班級參與程度				
低度	37.0	63.0	(779)	卡方值=0.111 自由度=1
高度	37.7	62.3	(975)	$p > 0.05$
班級討論氣氛				
低度	36.8	63.2	(1310)	卡方值=0.872 自由度=1
高度	39.3	60.7	(443)	$p > 0.05$
社團參與經驗				
有參與過	37.2	62.8	(799)	卡方值=0.044 自由度=1
沒有參與過	37.7	62.3	(956)	$p > 0.05$

資料來源：陳陸輝（2012），《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定群追蹤研究》。

說明：表中數值為橫列百分比。（括號內數值為樣本數）

在班級參與程度、班級討論氣氛與社團參與經驗方面，分析發現其與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之異同，在卡方獨立性檢定中並未達到顯著程度，筆者認為會造成這樣的結果，可能是因為受訪的大學生為大學一年級的學生，進入大學的時間並不長，所以受到學校環境影響的效果並不明顯。不過就分布的情況來看，大致上仍可看出班級參與程度較高的大學生或是當大學生處於高度討論的班級氣氛中，其有較高的機會與父母產生相異的政黨認同。

在交叉表初步分析之下，發現與學校相關的變項中，就讀學院類別會影響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之異同，就讀法社學院的大學生擁有愈高的機會與父母產生相異的政黨認同；而班級參與程度、班級討論氣氛與社團參與經驗等其他變項，與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並沒有顯著的關連性。

二、媒體因素對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的影響

大眾傳播媒體影響個人政治態度的效果明顯，個人往往藉由接收大眾傳播媒介所提供的資訊與信息，進而加深或改變自我的政治態度。表5-2 為探討媒體使用頻率與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傾向之間的關係。

表 5-2 媒體使用頻率與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一致性交叉分析表

	政黨認同一致性			統計檢定	
	相異	相同	(樣本數)		
總和	37.4	62.6	(1754)		
媒體使用頻率	高度	33.3	66.7	(463)	卡方值=4.603 自由度=1 $p < 0.05$
	低度	38.9	61.6	(1291)	

資料來源：陳陸輝（2012），《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定群追蹤研究》。

說明：表中數值為橫列百分比。（括號內數值為樣本數）

關於大學生使用媒體的頻率與其親子政黨認同之異同在卡方獨立性檢定中達到顯著程度($p < 0.05$)。高度使用媒體頻率的大學生其政黨認同與父母相異的比

率大約佔三分之一，政黨認同與父母相同的比率為 66.7%；低度媒體使用頻率的大學生，其政黨認同與父母相異的比率為 38.9%，相同的比率為超過六成。就研究發現，高度使用媒體頻率的大學生有較高的比率與父母產生相同的政黨認同，低度使用媒體頻率的大學生有較高的機會擁有與父母相異的政黨認同。此與本研究的假設並不相符，筆者推測會造成這樣的現象，可能是因為大學生在使用媒體的時間與場合，大部份都是在家裡，與父母一起觀看相同的電視頻道，如此一來，大學生與父母因為透過同一個媒體接收訊息，接收到的資訊相同，親子之間甚至會在使用媒體時發表自我的看法與討論、交換意見，造成彼此之間對於事物的觀念與態度愈趨相近，更進一步造成大學生與父母有較高的機會與父母擁有相同的政黨認同，而不似本研究原先所假設，認為透過媒體使用的頻率，大學生對於資訊接收的頻率提高之後，較容易培養自我思考的能力，有比較高的機會產生與父母相異的政黨認同。

第二節 家庭因素對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的影響

本節旨在探討家庭對於大學生政黨認同建構的影響，檢視其對於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之異同的影響。家庭因素變項將使用父母政黨認同強度和與父母的親疏程度兩個面向來觀察其與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的關係。當父母的政黨認同強度愈強時，代表父母對政治相關事務的關心程度也愈高，父母的政治態度更容易透過家庭教育傳遞給子女，再加上當大學生與父母的親疏程度愈高，表示其與父母的感情愈好、親密程度愈高，彼此之間更容易因為討論與交流意見，而子女承襲父母的政治態度與觀念。

表 5-3 為家庭變項與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一致性的交叉表。可以發現，父母政黨認同強度與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之異同在卡方獨立性檢定中達到顯著程度

($p < 0.001$)。父母政黨認同強度偏強的大學生，有 73.7% 會與父母擁有相同的政黨認同，只有兩成六的大學生會與父母擁有相異的政黨認同；而父母政黨認同偏弱的大學生，則有超過五成的大學生會與父母擁有相異的政黨認同。整體而言，當父母政黨認同強度愈強，大學生的政黨認同愈容易受到父母的影響，進而擁有與父母相同的政黨認同，超過七成三的大學生，其政黨認同及深刻的受到父母的影響與傳承。而當父母的政黨認同強度愈弱，父母傳遞政黨認同概念予子女的強度亦減弱，只有不到五成的大學生會擁有與父母相同的政黨認同。從這樣的結果，可以推論個人之於某種事物、態度的熱烈程度確實會展現在其外顯的影響程度上，尤其是在家庭當中，父母屬於教導者的角色，更容易將自我偏好灌輸給子女，子女在父母具有強烈政黨認同的情形下，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之下，愈容易擁有與父母相同的政黨認同。

表 5-3 家庭變項與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一致性交叉分析表

	政黨認同一致性			統計檢定
	相同	相異	(樣本數)	
總和	62.6	37.4	(1754)	
父母政黨認同強度	強	73.7	26.3 (457)	卡方值=76.710, 自由度=1, $p < 0.001$ Kendall's $\tau_b = -0.247, p < 0.001$
	弱	48.4	51.6 (804)	
與父母親疏程度	親近	64.7	35.3 (1385)	卡方值=12.714, 自由度=1, $p < 0.001$ Kendall's $\tau_b = -0.085, p < 0.01$
	疏遠	54.6	45.4 (370)	

資料來源：陳陸輝 (2012)，《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定群追蹤研究》。

說明：表中數值為橫列百分比。(括號內數值為樣本數)

接著討論與父母的親疏程度與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之異同關係，在卡方獨立性檢定中，亦達到顯著程度($p < 0.001$)。與父母較為親近的大學生，其中有 64.7% 會與父母擁有相同的政黨認同，將近三分之一的大學生會與父母擁有相異的政黨認同；而與父母關係較疏遠的大學生，則有 45.4% 的大學生會與父母擁有相異

的政黨認同。由此可以發現，當大學生與父母的親密程度愈親近時，子女愈容易受到父母的影響，有較高的機會去接受父母所傳遞的觀念與態度，子女與父母之間彼此的親密關係，也會透過這樣的互動愈趨緊密。也就是說，當大學生與父母的親密程度愈親近時，大學生的政黨認同愈容易受到父母的影響與傳承，擁有與父母相同的政黨認同。

整體來說，就從交叉表裡可以發現，大學生的政黨認同受到父母很深的影響，尤其當父母的政黨認同強度愈強，或是與父母的親疏程度愈親近時，大學生有很高的機會產生與父母相同的政黨認同，這樣的行為甚至是一種父母政治態度的傳承與子女模仿父母政治傾向的行為，由此可以驗證，家庭確實是個人養成政治態度的最重要社會化機構。

第三節 個人政治態度與個人背景對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的影響

本節主要在探討個人的政治態度與個人背景對於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之異同的影響。關於個人政治態度方面，筆者選取大學生的政治練達程度與政治效能感來觀察與父母政黨認同的關係。個人背景方面，則選取性別與就讀學校類別，嘗試釐清個人背景對於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之異同的影響。

一、個人政治態度對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的影響

個人對於政治事務的看法，經過媒體的傳遞訊息、社會的回應與自身的體驗與經歷之後，往往會進一步的形成個人的政治態度，甚至個人的政黨認同傾向也是從中建構而成的。表 5-4 為個人政治態度與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一致性的交叉

表。

分析發現，大學生所屬的政治練達程度與其親子政黨認同之異同在卡方獨立性檢定中並未達到顯著程度($p>0.05$)，政治練達程度較低的大學生其政黨認同與父母相異的比率為 39.1%，與父母相同的比率為約佔六成；相對於政治練達程度較高的大學生，其政黨認同與父母相異的比率為 34.9%，相同的比率為 65.1%。

表 5-4 個人政治態度與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一致性交叉分析表

		政黨認同一致性			統計檢定
		相異	相同	(樣本數)	
總和		37.4	62.6	(1754)	
政治練達程度	低	39.1	60.9	(1043)	卡方值=3.243 自由度=1 $p>0.05$
	高	34.9	65.1	(711)	
政治效能感	低	38.0	62.0	(1266)	卡方值=0.684 自由度=1 $p>0.05$
	高	35.9	64.1	(488)	

資料來源：陳陸輝（2012），《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定群追蹤研究》。

說明：表中數值為橫列百分比。（括號內數值為樣本數）

而大學生的政治效能感與對於親子政黨認同異同的影響，在卡方獨立性檢定中並未達到顯著程度，高政治效能感的大學生其政黨認同與父母相異的比率為 35.9%，與父母相同的比率為 64.1%；而低政治效能感的大學生其政黨認同與父母相異的比率為 38.0%，相同的比率為 62.0%。整體來說，大學生的政治練達程度與政治效能感，此兩方面的個人政治態度，與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之異同間無顯著的關連性。

二、個人背景對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的影響

接下來，將繼續觀察大學生個人背景與親子政黨認同一致性的關連性，表 5-5 即為其交叉分析表。首先是性別的部分，性別在卡方獨立性檢定中並未達到

顯著程度，男大學生與父母擁有相異政黨認同的比率是 37.6%，擁有相同政黨認同的比率是大約佔了六成二；女大學生與父母擁有相同政黨認同的比率是 62.8%，擁有相異政黨的比率是 37.2%。就分布的情況來看，大致上仍可看出男大學生，其政黨認同與父母相異的比率是較高的；而女大學生，與父母擁有相同政黨認同的比率較高，大致符合本研究的假設，認為男性對於政治事務的了解與參與程度較高，比較容易在面對政治事物時有自我的獨立思考與判斷，進而產生與父母相異的政黨認同。

表 5-5 個人背景變項與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一致性交叉分析表

		政黨認同一致性			統計檢定
		相異	相同	(樣本數)	
總和		37.4	62.6	(1754)	
性別	男生	37.6	62.4	(488)	卡方值=0.040 自由度=1 p>0.05
	女生	37.2	62.8	(1266)	
學校類別	公立	39.3	60.7	(486)	卡方值=1.037 自由度=1 p>0.05
	私立	36.7	63.3	(1268)	

資料來源：陳陸輝（2012），《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定群追蹤研究》。

說明：表中數值為橫列百分比。（括號內數值為樣本數）

接著討論學校類別的影響，由上表（表 5-5）可以發現，學校類別與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異同間的卡方獨立性檢定，並沒有達到顯著的程度。就讀公立學校的大學生，有將近四成的比率會與父母擁有相異的政黨認同，有 60.7% 的比率會擁有與父母相同的政黨認同；就讀私立學校的大學生，與父母擁有相異政黨認同的比率為大約三成六，而有 63.3% 比率的大學生會與父母擁有相同的政黨認同。就分布的情況可以發現，大致上仍符合本研究的假設，即就讀公立學校的大學生，其政黨認同與父母相異的比率較高，兩類學校大學生與父母擁有相異政黨認同的比率差了 2.6%。代表就讀公立學校的大學生，其學校的教育資源，甚至是家庭

教育的環境，都較容易使得大學生擁有獨立思考、自我判斷的能力，使得大學生有較高的機率擁有自我的政治傾向，與父母產生相異的政黨認同。

經過前三節的討論，本研究從學校環境、媒體使用情況與家庭因素，觀察其與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之間的影响。就學校環境方面，發現就讀法社學院的大學生，相較於就讀非法社學院的大學生，其政黨認同與父母相異的比率較高。筆者認為這是由於法社學院所提供的教育環境影響了大學生的自我獨立思考能力，所以有較高的機會擁有與父母相異的政黨認同。在媒體使用方面，發現高度使用媒體頻率的大學生，有較高的比率與父母產生相同的政黨認同，此與本研究的假設並不相符，筆者認為可能是因為大學生在使用媒體時，大多與父母共同接收相同的媒體資訊，使得彼此之間對於事物的態度愈趨相近，因此有較高的機會與父母擁有相同的政黨認同。在家庭因素方面，發現大學生的政黨認同受到家庭深刻的影響，當父母的政黨認同強度愈高，或是與父母的親疏程度愈親近時，大學生與父母擁有相同政黨認同的機會亦提高，父母透過家庭教育的影響與接觸，將自我的政治態度傳承給子女，顯示出家庭是政治社會化過程中不可忽略的一項重要媒介。下一節將進行模型的分析，摒除初步分析中無明顯影響的變數以建立一個主要迴歸模型，探討影響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異同的因素。

第四節 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異同的解釋模型

接下來，在本節當中，筆者將以二元勝算對數模型來分析社會系絡環境影響之下的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之異同，並檢證相關變項對於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的影響。其中班級討論氣氛、就讀學院類別、政治練達程度、父母政黨認同強度，以及與父母的親疏程度為類別尺度(categorical scale)，在處理變數時以虛擬變數

的方式處理，其餘變數均為連續尺度(continuous scale)，直接放入模型中，方便比較其對依變數的影響力大小。表5-6 為模型中連續變數(continuous variable)的分數分佈，以Cronbach's Alpha 值檢定之。

表 5-6 模型中各項量表之分數分佈表

影響變數	平均數	樣本數	信度檢定
社團參與程度 (1-4)	1.42	1754	0.77
與同學討論政治事務頻率 (1-4)	1.94	1754	0.80
媒體關注程度 (1-4)	1.80	1754	0.68
與父母討論政治事務頻率 (1-4)	2.01	1754	0.80

資料來源：陳陸輝 (2012)，〈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定群追蹤研究〉。

說明：信度檢定所列為內在一致性 (Cronbach's Alpha 值) 的結果。

筆者摒除初步分析中無明顯影響的變數以建立一個主要模型，探討影響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異同的因素。其中家庭因素之於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的影響，在本研究的假設當中，多為正向的影響，即家庭關係愈親密的大學生，其愈容易擁有與父母相同的政黨認同傾向。但本研究較感興趣的面向，試想在控制家庭與其它因素的影響之外，從社會系絡的角度切入，觀察其對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的影響，是否能影響大學生，使其擁有相異於父母的政治思考，進而與父母產生相異的政黨認同傾向。所以，本研究在初步捨去無顯著影響的變數納入模型分析之外，將控制家庭與其它因素，分別探討社會系絡的影響，先了解大學生就讀學院類別的影響，其次是社團參與程度，接下來是討論公共事務的頻率，最後則歸納出一個精簡模型，以觀察社會系絡之於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的影響。

首先，觀察表 5-7 模型一，模型一先將本研究感興趣的變數放入模型當中，發現就讀法社學院的大學生，比較容易與父母擁有相異的政黨認同；從另一方面來觀察，父母政黨認同強度愈強、與父母關係愈親近、與父母討論政治事務頻率較高、政治練達程度愈高以及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愈高的大學生，有愈高的機會與

父母擁有相同的政黨認同傾向。

就影響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異同之因素而言，當大學生就讀的學院為法社學院時，在統計上達到顯著程度。相對於就讀非法社學院的大學生，就讀法社學院的大學生，擁有與父母相異政黨認同相對於擁有與父母相同政黨認同的勝算比(odds ratio)，是其 1.778 倍。觀察大學生社團參與程度與親子政黨認同異同之間，可以發現大學生的社團參與程度，雖在統計上未達顯著程度，但當大學生參與社團的程度每上升一個單位，擁有與父母相異政黨認同相對於擁有與父母相同政黨認同的勝算比，變為原來的 1.113 倍。

在與探討與父母產生相異政黨認同方面，發現社會系絡中的就讀學院類別與社團參與程度顯著地影響大學生的政黨認同，使其受家庭的影響力下降，而在與父母產生相同政黨認同方面，亦肯定家庭環境所帶來的影響，尤其是在父母政黨認同強度、與父母的親疏程度、與父母討論政治事務的頻率、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以及政治練達程度方面，皆有顯著影響。

表5-7 社會系給影響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異同之二元勝算對數模型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係數 (標準誤)	勝算比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勝算比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勝算比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勝算比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勝算比 (標準誤)
常數	2.142 *** (0.362)	8.517 (0.148)	2.340 *** (0.328)	10.380 (0.198)	2.221 *** (0.331)	9.216 (0.146)	2.189 *** (0.359)	8.929 (0.123)	2.244 *** (0.331)	9.427 (0.331)
班級討論氣氛(以低班級討論氣氛為對照組)	0.146 (0.148)	1.157 (0.148)					0.210 (0.146)	1.233 (0.146)		
高班級討論氣氛										
學院(以其它為對照組)	0.576 ** (0.201)	1.778 (0.201)	0.586 ** (0.198)	1.796 (0.198)					0.610 ** (0.199)	1.841 (0.199)
法社學院	0.109 \$ (0.056)	1.113 (0.056)			0.108 \$ (0.055)	1.114 (0.055)			0.118 * (0.056)	1.125 (0.056)
社團參與程度(1至4分)	0.139 (0.136)	1.149 (0.136)					0.169 (0.135)	1.184 (0.135)		
與同學討論政治事務頻率(1至4分)	-0.169 \$ (0.101)	0.845 (0.101)	-0.119 (0.096)	0.888 (0.096)	-0.103 (0.095)	0.902 (0.095)	-0.148 (0.100)	0.862 (0.096)	-0.129 (0.096)	0.879 (0.096)
媒體關注程度(以低政治表達程度為對照組)										
政治表達程度	-0.306 * (0.132)	0.737 (0.132)	-0.293 * (0.131)	0.746 (0.131)	-0.231 \$ (0.129)	0.794 (0.129)	-0.261 * (0.130)	0.770 (0.131)	-0.290 * (0.131)	0.749 (0.131)
高政治表達程度										
父母政黨認同強度(以父母政黨認同弱為對照組)	-1.013 *** (0.135)	0.363 (0.135)	-1.009 *** (0.134)	0.365 (0.134)	-0.990 *** (0.133)	0.372 (0.133)	-0.996 *** (0.134)	0.369 (0.134)	-1.010 *** (0.134)	0.364 (0.134)
父母政黨認同強	-0.564 *** (0.123)	0.569 (0.123)	-0.486 *** (0.114)	0.615 (0.114)	-0.498 *** (0.115)	0.608 (0.115)	-0.558 *** (0.122)	0.572 (0.122)	-0.506 *** (0.115)	0.603 (0.115)
與父母討論政治事務頻率(1至4分)										
與父母親疏程度(以疏遠為對照組)	-0.363 * (0.156)	0.695 (0.156)	-0.378 * (0.155)	0.685 (0.155)	-0.425 ** (0.154)	0.654 (0.154)	-0.397 ** (0.155)	0.672 (0.155)	-0.380 * (0.155)	0.684 (0.155)
親近	-0.250 ** (0.362)	0.779 (0.362)	-0.241 ** (0.328)	0.786 (0.328)	-0.231 ** (0.088)	0.793 (0.088)	-0.233 ** (0.359)	0.792 (0.359)	-0.247 ** (0.089)	0.781 (0.089)
主觀家庭社會經濟地位(1至5分)										
樣本數	1258	1258	1258	1258	1258	1258	1258	1258	1258	1258
LR X ²	1553.105	1565.292	1565.292	1559.902	1559.902	1559.902	1564.788	1555.414	1564.788	1555.414
自由度	10	8	8	7	7	7	7	8	7	8
p 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Pseudo R ²	0.165	0.153	0.153	0.158	0.158	0.158	0.154	0.154	0.154	0.163

資料來源：陳陸輝(2012)，〈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定群追蹤研究〉。

說明 1：***，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p < 0.1$ （雙尾檢定）。

說明 2：各模型間的差異—模型一為納入全部變項的模型；模型二在學校變項中僅保留就讀學院類別；模型三在學校變項中僅保留社團參與程度；模型四在學校變項中僅保留班級討論氣氛與和同學討論政治事務頻率；模型五在學校變項中僅保留就讀學院類別與社團參與程度。

因本研究欲想探究在家庭影響之外，社會系絡因素之於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異同的情形，所以接著將分別就本研究較感興趣之社會系絡變項中的學校因素納入模型中進行觀察，以檢視其對於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的影響，首先是模型二與模型三，模型二在感興趣的學校變項中，僅關注就讀學院類別的影響；而模型三僅關注參與社團的程度。

模型二的部分，當大學生就讀的學院為法社學院時，其有較高的機會與父母產生相異的政黨認同。在統計模型分析中，當大學生就讀的學院為法社學院時，達到顯著程度。相對於就讀非法社學院的大學生，就讀法社學院的大學生，擁有與父母相異政黨認同相對於擁有與父母相同政黨認同的勝算比，是其 1.796 倍。且將模型二與模型一相比較，在拿掉其他學校變項的影響之後，只保留大學生就讀學院類別時，對於親子政黨認同異同之影響力確實有上升，在統計上亦達到顯著程度。關於社團參與程度之於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的影響，由模型三可以發現，當大學生社團參與程度比較高的時候，其有較高的機會與父母產生相異的政黨認同，雖在統計上未達到顯著程度。但相對於社團參與程度較低的大學生，社團參與程度較高的大學生，擁有與父母相異政黨認同相對於擁有與父母相同政黨認同的勝算比，是其 1.114 倍。將模型三與模型一相比較，捨去其他學校變項，僅保留參與社團程度時，顯示出社團參與程度在影響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異同的影響力稍稍下降，且兩個模型皆未達到顯著程度。

接下來，觀察模型四，可以發現當大學生在學校討論公共事務的頻率，不管是在班級討論氣氛方面，或是與同學討論政治事務的頻率方面，皆有較高的機會與父母產生相異的政黨認同，雖然在統計上未達到顯著程度。相對於班級討論氣氛較低的大學生，班級討論氣氛較高的大學生，擁有與父母相異政黨認同相對於擁有與父母相同政黨認同的勝算比，是其 1.233 倍。而與同學討論政治事務的頻率方面，當大學生與同學討論政治事務的頻率每提高一單位，傾向於與父母擁有相異的政黨認同相對於與父母擁有相同政黨認同的勝算比，變為原來的 1.184 倍。

將模型四與模型一相比較，在拿掉其他學校變項的影響之後，只保留班級討論氣氛與和同學討論政治事務的頻率，發現其對於親子政黨認同異同之影響力確實有上升，雖然兩者在統計上皆未達顯著程度。

最後，捨去上述學校變項中較不顯著的變數，保留就讀學院類別與社團參與程度這兩個主要變數，經過概似比檢定⁴（Likelihood Ratio Test）後，建立另一個精簡的模型五，從模型五可以發現，當大學生就讀的學院為法社學院、參與社團的程度愈高時，其有較高的機會與父母產生相異的政黨認同；就另一方面來看，父母政黨認同強度愈強、與父母愈親近、與父母討論政治事務頻率愈高、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愈高，以及政治練達程度愈高的大學生，則相反的，其有愈高的機會與父母擁有相同的政黨認同傾向。將模型五與模型一進行比較，在本研究感興趣的社會系絡變項中，發現就讀學院類別與社團參與程度其造成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相異的影響力皆上升，且在統計上皆達到顯著程度。故本研究認為，就觀察社會系絡之於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異同的影響，此精簡模型為最合適的模型。

就影響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異同之因素而言，當大學生就讀的學院為法社學院，以及社團參與程度較高時，有顯著的效果。相對於就讀非法社學院的大學生，就讀法社學院的大學生，擁有與父母相異政黨認同相對於擁有與父母相同政黨認同的勝算比，是其 1.841 倍。本研究結果顯示，就讀法社學院的大學生，其有較高的機會產生與父母相異的政黨認同，此與本研究的假設相符。筆者認為這是因為就讀法社學院的大學生在學校裡面所受到的教育所致，除了課程上的安排，有較多關於公共事務、政治資訊、政治制度，甚至是法律相關知識等課程，提供更多與政治、社會公共事務的訊息給大學生，讓大學生有更充足的資訊能夠了解公民社會的運作方式以及政治事務的運行，如此一來，增加對於公共事務的閱歷之後，再加上就讀法社學院的大學生，因著其本身對於人文社會、公共行政與法律等相關議題是較有興趣的，大學生能培養自我的獨立思考、判斷能力，進而產生自我的政治思考，有較高的機會擁有與父母相異的政黨認同。且大學生的社團參

⁴ Likelihood Ratio Test, LR $X^2=1555.414-1553.105=2.309$,d.f.=10-8=2,LR=4.618, $p>0.05$

與程度在統計上亦為顯著程度，當大學生參與社團的程度每上升一個單位，擁有與父母相異政黨認同相對於擁有與父母相同政黨認同的勝算比，變為原來的 1.125 倍，此結果即代表，學校社團參與程度的高低，確實會影響大學生與父母親政黨認同之間的關係，與本研究的假設相符，學生參與社團可以學習民主的生活方式、獲得活用的知識與適應變遷的環境，學校社團就像是一個小型的社會，提前讓學生體驗社會的民主運行方式。大學生在參與社團的過程中，即為一種學習的行動和過程，並且透過不同面向及不同程度的參與，會產生不同的學習。對於大學生而言，社團參與代表其平常的公民社會活動與參與經驗，在社團活動中，大學生可以藉由社團的團體生活經驗，學習寬容、合作、尊重與守紀律的公民素養，進而體認與學習民主的政治參與精神，與培養學生的民主價值觀。如此一來，大學生藉由參與社團的經驗，學習到現代社會中的公民素養，並且透過學習的過程，給與大學生更多接觸公共事務的機會，有助於大學生訓練其自我政治思考與判斷能力，故其有較高的機會與父母擁有相異的政黨認同。

接下來將檢視其他對於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產生異同的變項。就家庭因素方面，當父母政黨認同強度愈強、與父母關係愈親近，以及和父母討論公共事務頻率愈高的大學生，其擁有與父母相同政黨認同的機會較高。就父母政黨認同強度方面來看，父母政黨認同強度較強的大學生，傾向於與父母擁有相異政黨認同相對於與父母擁有相同政黨認同的勝算比，是父母政黨認同較弱大學生的 0.364 倍。關於與父母親疏程度，與父母愈親近的大學生，擁有與父母相異政黨認同相對於擁有與父母相同政黨認同的勝算比，是與父母較為疏遠大學生的 0.684 倍。在控制其他變數之後，當大學生與父母討論公共事務的頻率每上升一個單位，傾向於與父母擁有相異的政黨認同相對於與父母擁有相同政黨認同的勝算比，變為原來的 0.603 倍。以上關於家庭變數的影響符合本研究假設，在家庭當中，歷經長期共同生活與互動之後，彼此之間的情感建立在心理依附與信任關係之上，因此在交流的過程中，政治態度容易受彼此的觀念與態度所影響。Lane(1966:649-646)

認為父母親經常運用直接灌輸、提供社會環境與等認同方式，塑造其子女的政治信仰，也是因為父母傳遞政治價值給子女的結果，使得社會的基本價值能夠世代相傳，政治文化得以延續。如此一來，就研究結果發現，當家庭環境因素強度愈強，則大學生愈容易受家庭環境所影響，其政治意向愈趨相近。

關於大學生政治練達程度與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方面，研究發現，政治練達程度愈高的大學生，愈容易擁有與父母相同的政黨認同，政治練達程度愈高的大學生，傾向於與父母擁有相異政黨認同相對於與父母擁有相同政黨認同的勝算比，是政治練達程度較低大學生的0.749倍。且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大學生，其政黨認同也有愈高的機會與父母相同，在控制其他變數之後，當大學生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每上升一個單位，傾向於與父母擁有相異的政黨認同相對於與父母擁有相同政黨認同的勝算比，變為原來的0.781倍。上述關於政治練達程度與家庭社經地位的研究發現與本研究原先的假設並不相符，首先關於政治練達程度方面，筆者認為會造成這樣的現象，可能因為個人政治相關概念的培養、政治行為的展現，甚至是自我政治態度的建立，最主要仍受到家庭的影響，在此過程中，家庭中的父母將自我政治態度、政治觀念與行為等傳遞給子女，甚至是行為上潛移默化的教育效果，從另一方面來看，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一種子女模仿父母的政治態度、觀念的行為，在這樣的家庭環境影響之下，使得大學生的政治知識、政治興趣與政治參與的程度，大部分皆從父母習得而來，進而產生，政治練達程度較高的大學生，其有更高的機會與父母產生相同的政黨認同，擁有相似的政治思考與態度。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方面，本研究的假設認為，當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愈高時，代表家庭所能提供的物質與環境的較佳，有利於學生培養獨立思考能力在學習成就上的表現。但就研究發現，社會經濟地位愈高的大學生，愈容易擁有與父母相同的政黨認同，筆者認為其原因可能可以從兩個面向作解釋，一為雖然社經地位較高的父母，除了會對子女的教育成就有直接正面影響，但同時也會影響家庭結構的大小，Vrooman 與Dronkers（1986：69-78）的研究發現，擁有高

社會經濟地位的父母，所擁有的子女數愈少；而子女數愈多的家庭，其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往往比較低，再加上高社經地位的父母對於子女的教育成就通常較為看重，林義男（1993：157-212）表示，父母實際參與子女學習的情形與社會經濟地位相關，社經地位較高的父母，參與孩童學習的意願較高，顯示出社會經濟地位的高低，會影響父母對於子女的教育態度與關懷方式；二為家庭社經地位較低的大學生，其有較高的機會提前先擁有社會經歷，例如需要在求學階段開始打工賺取學費或生活費等，在打工的過程中開始接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因此降低家庭的影響力。如此一來，當家庭中的子女數目較少，處於高社經地位的父母對於子女教育成就的標準較高，更容易使得父母對於子女的教育、態度與行為的養成有更深切的影響效果，加上社經地位較低的大學生，提早接受社會經歷的影響，降低家庭傳成的影響力，使得子女與父母的價值觀念、思考模式，甚至是政治態度愈趨相近。

另外，關於媒體關注程度方面，就數據顯示，當大學生的媒體關注程度每上升一個單位，傾向於與父母擁有相異的政黨認同相對於與父母擁有相同政黨認同的勝算比，減少為原本的 0.879 倍。換言之，代表當關注媒體程度愈高時，大學生愈容易擁有與父母相同的政黨認同，此研究發現與本研究的假設並不相符，本研究認為，當關注大眾傳播媒介的程度愈高時，代表人們投入更多的心力與時間去獲得政治資訊，在政治訊息的傳遞與互動中，人們更有機會可以培養自我的政治態度。筆者認為造成這樣的現象，可能是因為大學生使用媒體的時間與場合，大部份都是在家中，大學生與父母之間收看或收聽的資訊有很高的機會是藉由同一個管道所傳遞的訊息，再加上當大學生與父母一同接收資訊時，彼此之間也有較高的機會共同討論、分享看法，進而產生相近的政治思考或政治概念，尤其父母更容易經過這樣的互動過程將自我的政治思考傳遞給子女，使得關注媒體程度愈高的大學生，愈容易與父母擁有相同的政黨認同傾向。

第五節 小結

本章前三個小節先觀察學校因素、媒體因素、家庭因素以及大學生個人政治態度與個人背景分別與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傾向之間的關係，並以卡方獨立性檢定來檢測其在統計上是否達到顯著程度。在第四小節中，則初步摒除分析中無明顯影響的變數，將顯著影響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之變數納入二元勝算對數模型當中，以分析社會系絡之於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的影響。

首先，就學校環境方面，發現就讀法社學院的大學生，相較於就讀非法社學院的大學生，其政黨認同與父母相異的比率較高。筆者認為這是由於學院所提供的教育環境有效的培養了大學生的自我獨立思考能力，使得大學生有較高的機會擁有自我的政治的態度，進而產生自我的政治思考，更容易與父母擁有相異的政黨認同。在家庭因素方面，發現大學生的政黨認同受到家庭影響的程度很高，當父母的政黨認同強度愈高，或是與父母的親疏程度愈親近時，大學生與父母擁有相同政黨認同的機會亦增加，父母透過家庭的傳遞與教育，將自我的政治態度傳承給子女，顯示出家庭是政治社會化過程中不可忽略的一項重要媒介。在媒體使用方面，發現高度使用媒體頻率的大學生，有較高的比率與父母產生相同的政黨認同，筆者認為可能是因為大學生在使用媒體時，大多與父母共同接收相同的媒體資訊，使得親子間對於事物的態度愈趨相近。最後，政治練達程度較高的大學生有較高的比率與父母產生相同的政黨認同，筆者認為可能是因為父母將自我的政治觀念與行為等傳遞給子女，使得個人的政治態度、政治參與等行為，仍受到家庭的影響所致，在某種程度上，子女也是模仿與傳承父母的政治態度與行為。

接著觀察模型分析，在影響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的變項中，關於社會系絡方面，發現當大學生就讀的學院為法社學院、參與社團的程度愈高時，其有較高的機會與父母產生相異的政黨認同，顯示出社會系絡確實會影響大學生的政治態度，

使得大學生產生與父母相異的政治態度，減緩家庭對於子女政治態度的影響。就家庭因素及個人政治態度方面來看，父母政黨認同強度愈強、與父母愈親近、與父母討論政治事務頻率愈高、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愈高，以及政治練達程度愈高的大學生，則有愈高的機會與父母擁有相同的政黨認同傾向，此部分則驗證了先前的研究，說明了家庭之於個人政治態度的重要性與影響力。





第六章 結論

在政治社會化的相關研究當中，藉由過去的資料可以發現，在個人政黨認同的形成過程中，家庭社會化為一重要的因素，父母親的政黨認同透過家庭之政治社會化過程傳遞給子女，子女通常會承襲父母親的政黨認同，與父母親擁有相近，甚至是相同的政黨認同。而本研究欲從另一個角度——社會系絡，進行探討，了解社會系絡對於子女與父母親擁有相異的政黨認同的關係，是否產生影響，使其並未承襲家庭政治社會化的傳承，進而發展出屬於自我的個人政黨認同。

本研究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將重心放在社會系絡對於政治社會化中對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異同之影響。筆者藉由建立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異同的解釋模型，分析社會系絡對於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的影響，並找出其它影響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異同的因素。以下本章將先說明本文之研究發現，並驗證研究假設是否成立，接著討論本研究過程中遇到的研究限制，並提出建議以供未來相關研究學者參考。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在研究假設中，筆者根據國內外文獻認為社會系絡中，尤其是學校的相關變項有助於大學生培養自我獨立思考與判斷能力，使得大學生較容易養成自我的政治思考與政治態度，而在政治態度上，減緩家庭當中，父母所給予的影響，有較高的機會與父母擁有相異的政黨認同。另外，父母政黨認同強度、與父母親疏程度、與父母討論政治事務頻率、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媒體使用頻率、媒體關注程

度、政治效能感以及政治練達程度等變數都將影響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之異同。

一、初步發現

在本研究初步分析中有以下發現：

- (一)、從政黨認同的三分類來了解大學生與父母親政黨認同傾向的分佈情形，發現大學生以沒有偏向特定政黨的獨立選民比率最高，筆者認為應該是因為此次受訪的大學生才剛從高中畢業，對社會公共事務，甚至是政治事務仍然不太瞭解，更缺乏政治的相關經驗，因此具有政黨認同的比例偏低。
- (二)、父母親支持的政黨，首選皆為泛藍政黨，父親的部份其次為泛綠政黨，母親的部份以獨立選民者次之。相較之下，父親是比較傾向支持泛綠政黨的，可能是因為泛綠政黨注重改革的形象與男性具有冒險犯難的精神較符合，而母親則較傾向支持偏保守的泛藍政黨，顯示出泛藍政黨的安定感及穩定性是吸引女性支持者的。
- (三)、關於父親與母親政黨認同對大學生政黨認同的影響，本研究發現，大學生分別與父親及母親的政黨認同都有很高的相關性，有七成二以上的大學生與父親的政黨認同一致，也有至少七成三以上的大學生與母親的政黨認同一致。整體看來，當父親及母親具有特定政黨認同傾向時，大學生多會認同父母親的政黨傾向，並形成自己的政黨認同，與父母親的政黨認同不一致的大學生較少。
- (四)、本文觀察親子政黨認同之異同與大學生政黨認同之間的關係，當親子政黨認同相同時，大學生傾向認同泛藍政黨的比率佔了約四成六；而當親子政黨認同相異時，大學生擁有特定政黨認同，傾向泛藍或泛綠政黨的比例都偏低，成為獨立選民的比例約為高達五成六以上，筆者認為這是因為當親子間對於政黨認同沒有共識時，降低了父母之於特定政黨認同傳遞的效果，使得大學生對於政黨認同概念較陌生與混亂，如此一來，使得大學生

不容易傾向特定政黨，而有較高的機會成為獨立選民。

(五)、在初步的交叉分析中發現，就讀學院類別、使用媒體頻率、父母政黨認同強度、父母的親疏程度以及政治練達程度等變數都是與大學生政黨傾向有相關性的，初步符合本文假設。而性別、班級參與程度、社團參與經驗以及就讀學校類別則是在初步分析中便未通過統計檢定，與假設並不相符。

二、迴歸模型發現

除了交叉分析外，筆者更進一步建立模型，將初步分析中顯著影響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異同之變項納入二元勝算對數模型當中，以分析社會系絡對於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異同的影響。

就模型分析發現，當大學生就讀的學院為法社學院、參與社團的程度愈高時，大學生與父母擁有相異政黨認同的機會較高，顯示出就讀學院類別與社團參與程度確實是影響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因素之一，其減緩家庭中父母政治態度的傳遞與影響力；就另一方面來看，父母政黨認同強度愈強、與父母愈親近、與父母討論政治事務頻率愈高、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愈高，以及政治練達程度愈高的大學生，與父母擁有相同政黨認同的機會較高，這部份驗證家庭社會化的研究，顯示出家庭之於大學生政黨認同的概念仍有高度的影響力。

首先，關於社會系絡影響大學生的政黨認同，使其擁有與父母相異政黨認同的因素探討方面，本研究發現，就讀法社學院的大學生，其有較高的機會與父母產生不一樣的政黨認同，符合本研究的假設。筆者認為這是因為學校教育影響法社學院大學生的結果，就環境方面的影響，除了課程上豐富的公共事務及相關議題的安排，提供更多社會議題、政治事務的訊息，讓大學生有更充足的資訊能夠了解公民社會的運作方式以及政治事務的運行，再加上就讀法社學院的大學生，因著其本身對於人文社會與公共行政等相關議題是較有興趣的，有助於大學生培

養自我的獨立判斷能力，進而產生自我的政治思考，有較高的機會擁有與父母相異的政黨認同。

接著觀察大學生社團參與程度與親子政黨認同異同之間，也可以發現，熱衷於參與社團的大學生，與父母親擁有不一樣政黨認同的機會亦較高。也代表，社團參與程度的高低，確實會影響大學生與父母親政黨認同之間的關係。符合傅木龍（2000：16-20）的研究發現，學生參與社團可以體認社會多元民主，學習民主的生活方式、獲得活用的知識與適應變遷的環境。Astin（1993：117-137）亦曾表示，學生的參與行為，代表的是大學生與學校體系及社會體系之間的一種互動關係，在學生發展上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而且參與愈多，所學到的知識和自我成長也愈多。顯示出大學生參與社團的行為，是一種學習的行動和過程，並且透過參與程度的不同，以及不同面向的接觸與了解，產生不同的學習效果與影響。對於大學生而言，社團參與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代表其平常的公民社會活動與參與經驗，就像是一般公民參與社會公共事務一般，在社團活動中，大學生可以藉由社團的團體合作經驗，學習寬容、尊重與守紀律的公民素養，進而體認與學習民主的政治參與精神，培養學生的民主價值觀。如此一來，大學生藉由參與社團的經驗，學習到現代社會中的公民素養，並且透過學習的過程，有更多接觸公共事務的機會，有助於大學生訓練其自我政治思考與判斷能力，故其有較高的機會與父母擁有相異的政黨認同。

接下來討論哪些因素會使得大學生與父母擁有相同的政黨認同，顯示出家庭重要的影響力，首先，就家庭因素方面，當父母政黨認同強度愈強、與父母關係愈親近，以及和父母討論公共事務頻率愈高的大學生，其擁有與父母相同政黨認同的機會較高。在家庭當中，歷經長期共同生活與互動之後，彼此之間的情感建立在心理依附與信任關係之上，因此在交流的過程中，政治態度容易受彼此的觀念與態度所影響。此發現符合 Lane（1966：649-646）的說法，其認為父母親經常運用提供社會環境，或是直接傳承等認同方式，來建構其子女的政治信仰，且

社會的基本價值能夠世代相傳，政治文化得以延續，也是因為父母傳遞政治價值給子女的結果。更佐證了Niemi 與 Jennings 在 1965 年對美國高中生所做之研究，認為子女會透過平時對父母的觀察與互動、相處的過程，來認知父母親的政治態度與看法，即表示，父母親的政黨認同會透過家庭社會化的過程傳遞給孩子，顯示出父母的政黨認同對子女有極重要的影響，產生政黨認同世代傳遞的現象。就研究結果發現，當家庭環境因素強度愈強，則大學生愈容易受家庭環境所影響，其政治意向愈趨相近。以上關於社會系絡的變項影響大學生擁有與父母相異的政黨認同，以及家庭環境變項影響大學生與父母擁有相同的政黨認同，皆符合本研究的假設。

另外，關於本研究與假設不相符原因之探討，首先就學校班級參與程度、班級討論氣氛與和同學討論政治事務頻率方面，本研究就過去文獻的探討，認為當大學生進入青少年階段後，與同儕相處的時間日益增加，由於年齡相近、身分相若，彼此在互動的過程中相互影響，逐漸成為政治態度形成過程中的重要參照團體之一（Riesman，1993），在本研究結果中卻發現班級學校與同儕的影響力不若先前的研究，筆者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可以分為兩個面向，一為此次受訪的學生為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其受學校環境的影響不深，連帶的與同學相處的情形可能也較不頻繁與緊密；另一方面受到臺灣社會氛圍的影響，為了避免與他人起爭執，政治議題或政治事件往往都是大家盡量避免提及的敏感話題，如此一來，使得大學生在學校當中，受班級的影響較小，並且在與同儕討論政治事務的頻率或內容上，都較為貧乏，使得學校、班級環境對於大學生政治態度養成的效果不顯著。

接著就媒體使用方面來做探討，就過去文獻顯示，個人平日的媒介使用程度可以有效的解釋其政治參與行為。Norris（1996：474-80）即曾經表示，大眾媒介的重要功能在於提供民眾政治社會相關資訊，而這些資訊對民眾的公民參與有正面功能，對於個人的政治學習更有顯著的幫助。顯示出媒體的使用頻率和關注程度會影響個人的政治態度與政治行為。就本研究結果發現，個人使用媒體的頻

率或關注媒體的程度，對於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之異同的影響，大致上具有顯著程度，但因為本研究在設立研究假設時，忽略大學生在使用大眾傳播媒介時，尤其是電視新聞為一般大眾最常使用的媒體媒介，其通常與父母共同使用，在這樣的接收媒體資訊方式之下，父母與子女一同接收來自同個傳播媒體的訊息，加上親子之間有很大的機率會就所接觸到的事物進行討論與自我價值觀念的傳遞，造成親子之間的想法日趨相近，甚至擁有相近或相似的政治態度。

最後就政治練達程度、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性別方面來做探討，本研究發現，政治練達程度愈高的大學生，愈容易擁有與父母相同的政黨認同；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大學生，其政黨認同也有愈高的機會與父母相同；性別的部分，則與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無顯著的關連性。上述關於政治練達程度、家庭社經地位與性別的研究發現，與本研究原先的假設並不相符，關於政治練達程度，筆者認為可能是因為個人政治概念的培養、政治行為的展現，甚至是自我政治態度的建立，最主要仍受到家庭的影響，在此過程中，家庭中的父母將自我政治態度、政治觀念與行為等傳遞給子女，甚至是行為上潛移默化的教育效果，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一種子女模仿父母的政治態度、觀念的行為，在這樣的家庭環境影響之下，使得大學生的政治知識、政治興趣與政治參與的程度，大部分皆從父母習得而來，進而產生，政治練達程度較高的大學生，其有更高的機會與父母擁有相似的政治思考與態度。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方面，就研究發現，社會經濟地位愈高的大學生，愈容易擁有與父母相同的政黨認同，筆者認為其原因可能是因為，社經地位較高的父母，家庭子女數目較少，再加上高社經地位的父母對於子女的教育程就通常較為看重，增加家庭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家庭社經地位較低的大學生，其有較高的機會提前先擁有社會經歷，例如需要在求學階段開始打工賺取學費或生活費等，在打工的過程中開始接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因此降低家庭的影響力，如此一來，更容易使得父母對於子女的教育、態度與行為的養成有更深切的影響效果，使得子女與父母的價值觀念、思考模式，甚至是政治態度愈趨相近。關於

性別方面，研究發現大學生的性別與其親子政黨認同異同之間不具關聯性，可能是在這個年齡層，男大學生的政治經驗還十分缺乏，因此分析結果不若以整體選民為研究對象時，性別對選民的政治興趣和政治參與有顯著影響。

就以上研究發現，可以歸納出社會系絡之於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有其影響力，雖然影響力仍然不及家庭環境的影響，此現象說明了對於大學一年級學生的政治態度而言，家庭的影響力大於社會系絡的影響力，大學生尚未能夠真正離開家庭，受到家庭影響的程度仍然較深且穩固，而社會系絡雖亦有影響力但影響效果並不深刻，可能是因為本受訪對象為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其受學校環境影響的時間較短，故如果拉長觀察的時間，當大學生接受學校環境的影響時間拉長之後，相信社會系絡之於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的影響亦會增加，而家庭因素的影響力會漸漸趨緩，使得大學生能夠真正的「離開家庭」。

第二節 檢討與建議

在本文研究過程當中，研究設計以及資料運用時，受到了許多的限制，將在此提出檢討與討論，另外並提出幾點建議以供往後相關研究學者做為參考。

筆者在研究過程當中，主要受到了樣本數過少的問題而困擾。本文目的旨在分析大學生、父親以及母親的政黨認同的差異程度，以探討社會系絡之於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異同的影響。然而筆者並未考慮到在臺灣社會中，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相同樣本與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相異樣本分佈上的懸殊，親子政黨認同相同的比率極高，相異的比率偏低，如果繼續將相異程度加以細分的結果，將使其在迴歸分析中的參數無法估計而無法探究其對親子政黨認同異同的影響，最後筆者決定將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僅分類為相同與相異兩類，這是本文主要受到的限制。雖然如此，筆者認為這也寫實地反應出目前臺灣家庭中政黨認同的分佈情形，大

學生與父母親可能受到家庭及婚姻的影響，再加上華人觀念裡以家庭概念為重，加深家庭之於子女的影響，使得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完全一致的比例大增，而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相異的比例雖然少，但也有其值得加以研究的價值。因此筆者認為，如果可以增加樣本數，使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的異同程度能有效的進行三分類，分為完全一致、低度相異與高度相異等三個尺度，即更能深入探究影響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異同的原因。另一研究限制則為測量方法上的信度問題，因為此研究為自填式問卷，讓大學生自行用筆勾選與填寫問卷，如此一來，受試者隨意回答，非認真作答的可能性會提高，又在臺灣歷經多年的政治紛亂的社會風氣之下，人們對於政治事務的態度大多抱持著較為冷漠的心態，而現在大學生對於社會事務、公共事務的關心與關注程度可能也會偏低，造成受試者未認真思考與了解題意，造成無法準確測量受試者真實心態的情況。本文已盡力從社會系絡的角度為出發點，去探究可能影響大學生政治態度的影響變數，但個人價值觀的建構與琢磨，甚至是改變，皆是受到許多因素影響而成，本研究在概念的構想上，可能仍有疏漏、未考量完備的地方，造成研究成果的缺失。

本文主要在處理社會系絡如何造成政治社會化的傳遞，探討造成大學生親子政黨認同異同的原因。但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資料，受訪對象為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其所受學校環境影響時間較短，而受家庭影響程度較高，所以在觀察社會系絡的影響上可能較不那麼明顯，但仍有其影響力，所以建議之後的研究者，可就受學校環境影響程度較高的大學三年級或四年級生為分析的對象，甚至是就同一批大學生，進行為期四年的定群追蹤研究，觀察大學生在剛進入大學，以及在大學四年後，受學校環境影響的程度。另外，一般來說，政治社會化上的研究多以調查訪問為主，本文也以量化方法來進行研究分析，但在本文要處理的問題是較為細膩而且深入的，也許可以進一步輔以質性研究方法，比較能夠瞭解學校環境與家庭組織內部細膩的關係，但缺點是無法推論至母體，因此，筆者認為進一步的研究可以在量化與質化的研究之間折衷而相輔相成。

本文僅以初探性的研究出發，期許透過本文的發現，使得相關研究學者更能注重社會系絡在政治社會化中政黨認同傳遞上所扮演的角色，往後不僅只是單單注意家庭所帶來的傳遞效果，更要深入瞭解社會系絡的影響力，釐清兩者之於個人建構政治態度過程中的效果，期待學界一同努力，以探究社會系絡之於個人政治態度建構的影響。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何進財，2001，《學生事務與社團輔導》，臺北市：東吳大學。
- 李惠加，1997，《青少年發展》，臺北：心理出版社。
- 李輝，1994，〈影響國小兒童自我觀念發展之重要因素〉，《國民教育》，34：6-9。
- 呂亞力，1986，〈基本權利與社會層級系統的建構〉，《憲政思潮》，75：112-125。
- 吳乃德，1999，〈家庭社會化和意識型態：臺灣選民政黨認同的世代差異〉，《臺灣社會學研究》，3：53-85。
- 吳宗佑、徐瑋伶、鄭伯璦，2002，〈怒不可遏或忍氣吞聲：華人企業主管威權領導與部屬憤怒反應〉，《本土心理學研究》，18：3-49。
- 吳重禮、許文賓，2003，〈誰是政黨認同者與獨立選民？-以二00一年臺灣地區選民政黨認同的決定因素為例〉，《政治科學論叢》，18：101-140。
- 吳重禮、湯京平、黃紀，1999，〈我國政治功效意識測量之初探〉，《選舉研究》。
- 林義男，1990，〈大學生的學習參與、學習型態與學習成果的關係〉，《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學報》，6(2)：23-44。1993，〈國小學生家庭社經背景、父母參與與學業成就的關係〉，《輔導學報》，16：157-212。
- 胡佛，1998，《政治參與與選舉行為》，臺北：三民書局。
- 張佑宗、趙珮如，2006，〈社會脈絡、個人網絡與臺灣2004年立法委員選舉選民的投票抉擇〉，《臺灣民主季刊》，3(2)：1-38。
- 張春興，1992，《心理學》，臺北：東華書局。
- 袁頌西，1969，〈政治社會化：政治學中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思與言》，7(4)：216-226。
- 徐火炎，1995，〈選民的政治認知與投票行為〉，《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7(1)：247-288。

- 陳美芬，1996，〈學童認同對象與自我觀念之關係研究〉，國立臺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陸輝、耿曙，2008，〈政治效能感與政黨認同對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臺灣民主季刊》，5(1)：87-118
- 陳蜜桃，1996，〈我國臺灣地區國中學生批判思考的相關因素及其教學效果之分析研究〉，《教育學刊》，12：71-148。
- 陳義彥，1979，《臺灣地區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臺北：德成書店。
- 莊天憐，2000，〈我國獨立選民的發展與變遷（1989～1999）〉，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 連偉廷，2007，〈社會網絡、媒介使用與政治功效意識之分析〉，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 傅木龍，2000，〈校園學生社團活動之發展與輔導〉，《訓育研究》，39(1)：16-20。
- 黃玉，2000，〈大學學生事務的理論基礎—臺灣大學生心理社會發展之研究〉，《公民訓育學報》，9：161-200。
- 黃信豪，2006，〈政治功效意識的行動效果（1998-2003）〉，《臺灣民主季刊》，3(2)：119-158。
- 黃毅志，2002，〈社會階層、社會網絡與心理幸福〉，《社會階層、社會網絡與主觀意識》，111-143，臺北：巨流。
- 彭芸，2001，《新媒介與政治》，臺北：五南。
- 游盈隆，1993，〈政治信念、競選策略與選舉動員：臺灣地區二屆立委候選人競選模式之研究〉，《東吳政治學報》，2：375-392。
- 楊婉瑩，2007，〈政治參與的性別差異〉，《選舉研究》，14(2)：53-94。
- 趙曉美，2001，〈自我概念多層面階層結構之驗證暨增進自我概念課程之實驗效果〉，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
- 劉清芬，2000，〈國小學生批判思考、情緒智力與學業成就關係之研究〉，國立高

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羅寶鳳，1996，〈成人在組織中的學習理論之初探〉，《社教雙月刊》。

二、外文部分

Astin, Alexander W. 1993. *What Matters in College? Four Critical Years Revisited*.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ress.

Bandura, A. 1971. "Analysis of Modeling Processes." *In Psychological Modeling?*
Chicago: Aldine-Atherton.

Campbell, A., P. E. Converse, W. E. Miller, and D. E. Stokes.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ampbell, A., G. Gurin, and W. E. Miller. 1954. *The Voter Decides*. Evanston: Row, Peterson Press.

Cooley, C.H. 1964.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Press.

Dawson, Richard E., and Prewitt Kenneth. 1969.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n Analytic Study*. Boston: Little, Brown Press.

Delli Carpini, M.X.2004. "Mediating Democratic Engagement: The Impact of Communications on Citizens' Involvement in Political and Civic Life."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ahwah: LEA Press.

Delli Carpini, M.X., and S.Keeter, 1996. *What Americans Know About Politics and Why It Matte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onelson R.F.1990. *Group Formulation. Group Dynamics*. Carlifornia: Pacific Grove Press.

Emirbayer, M., and J.Goodwin, 1994. "Network Analysis, Culture and The Problem of Agenc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99:1411-1454.

Ehman, Lee H. 1980 "The American School in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Process."

-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50(1): 99-119.
- Eveland, W. P., K. Marton, and M. Seo. 2004. "Moving Beyond 'Just The Facts': The Influence of Online News on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Public Affairs Knowledg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1: 82-108.
- Huckfeldt, Robert, and John Sprague. 1987. "Network in Context: The Social Flow of Political Inform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1 (4):1197-1216.
- Jennings, M. Kent, and Gregory B. Markus. 1984. "Partisan Orientations Over the Long Hall: Results From the Three-Wav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Panel Stud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8 (4):1000-1018.
- Johnston, M., W. Philips Shively, and R. V Stein. 2002. "Contextual Data and the Study of Elections and Voting Behavior: Connecting Individuals to Environments." *Electoral Studies* 21 (2):219-33.
- Kenny, Christopher B. 1994. "The Microenvironment of Attitude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s* 56(3): 715-728.
- Kinder, Donald R. 1998. "Communication and Opinio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 167-197.
- Kohl, J., and J. Reisman. 1993. *Intimate Relationships, Marriage, and Families*. Mountain View, CA: May Field Press.
- Lackey, A. S. and L. Dershem. 1992. "The Process Pedagogy: What Doe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each."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27(3):220-234.
- Lane, Robert E. 1996. "The Decline of Political and Ideology in a Knowledgeable Socie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1(5):649-662.
- Lau, R.R., and R. Erber. 1985. "Political Sophistication: An Information-Processing Perspective." In *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Thought*. Beverly Hills: Sage.
- Lazarsfeld, Paul., Bernard Berelson, and Hazel Gaudet. 1944. *The People's Cho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ee, J.N., and Y.G.Kim.1999. “ Effect of Partnership Quality on IS Outsourcing Success: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Empirical Valid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15(4):29-61.
- Lin,N., A. Dean,and W.Ensel. 1981. “Social Support Scales: A Methodological Note.” *Schizophrenia Bulletin* 7(1):73-89.
- Luskin,R. C.1987. “Measuring Political Sophistic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1(4).
- McLeod, J.M., D.Scheufele, and P.Moy. 1999.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and Participation: The Role of Mass Media and Interpersonal Discussion in Loc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6: 315-336.
- McLeod, J. M. and S. H.Chaffee. 1972.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The Social Influence Process*. Chicago: Aldine-Atherton Press.
- McPhee, William.1963. “A Theory of Informal Social Influence.” *Formal Theories of Mass Behavior*.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 Mead, George Herbert.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iller, Warren E., J. Merrill Shanks.1996. *The New American Vote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onroe, Alan D.1975. *Public Opinion in America*. New York: Dodd, Mead and Company Press.
- Mutz, Diana .2002.” The Consequences of Cross-Cutting Networks fo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6(4):838-55.
- Niemi, Richard G., M. Kent Jennings. 1991. “Issues and Inheritance in the Format of Party Identific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5(4): 970-988.
- Norris, Pippa.1996. “ Does Television Erode Social Capital? A Reply to Putnam,”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9(3): 474-80.

- 2000. *A Virtuous Circl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s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trick, John J. 1977.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School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Pinkleton, Bruce E., Erica W. Austin, and Kristine K. J. Fortman. 1998.
 "Relationships of Media Use and Political Disaffection to Political Efficacy and
 Voting Behavior."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 42: 34-49.
- Harris P.G., M. A. Whitmore. 1993. "Alternative Solders for Electronics Assemblies."
Circuit World 19(2):25-27
- Putnam, Robert D. 1966.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the Local Commun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0(3): 640-654.
- Rudolph, Thomas J., Amy Gangl, and Dan Stevens. 2000. "The Effects of Efficacy
 and Emotions on Campaign Involvement." *Journal of Politics* 62(4):1189-1197
- Scheufele, Dietram A. 2002. "Examining Differential Gains from Mass Media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Participatory Behavi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9(1):46-65.
- Sniderman, Paul M., Joseph F. Fletcher, Peter H. Russell, Philip E. Tetlock, and Brian
 J. Gaines. 1991. "The Fallacy of Democratic Elitism: Elite Competition and
 Commitment to Civil Libert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1(3):349-70.
- Wilkins, K. G. 2000. "The Role of Media in Public Disengagement from Political Life."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 44(4): 569-580.
- Verba, Sidney, Kay Lehman Schlozman, and Henry E. Brady. 1995. *Voice and Equality,
 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Vrooman, J. C. and J. Dronkers. 1986. "Changing Educational Attainment Processes:
 Some Evidence from the Netherland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59: 69-78.

Walker, K.N., MacBride, A. and Vachon, M.L.S.. 1977.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and the Crisis of Bereavement."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11(1): 35-41.





附錄一 變數建構表

變數 名稱	問卷問題	編碼方式
政黨認同	<p>『我們社會上有人說他自己是「支持國民黨的」，有人說他是「支持民進黨的」，也有人說他是「支持親民黨的」，也有人說他是「支持臺聯的」。請問您認為自己（父親、母親）是「支持國民黨的」、「支持民進黨的」、「支持親民黨的」、「支持臺聯的」，還是支持其他政黨？』</p> <p>若受訪者回答「都支持」、「都不支持」、「其它」時，則追問：請問您自己（父親、母親）比較偏向國民黨、偏向民進黨、偏向親民黨，偏向臺聯或是都不偏？</p>	<p>合併為泛藍政黨、獨立選民與泛綠政黨三類：</p> <p>1. 泛藍政黨： 國民黨及親民黨</p> <p>2. 獨立選民： 沒有政黨偏向及無反應</p> <p>3. 泛綠政黨： 民進黨與臺聯</p>
班級參與 程度	<p>『請問您會不會加入課堂上的討論或表達意見？』</p> <p>『您在班會或各種社團會議上會不會發言？』</p>	<p>1. 從未；2. 很少；3. 有時 4. 時常。兩題加總：1-4編碼為低度班級參與，5-8編碼為高度班級參與。</p>
班級討論 氣氛	<p>『一般來說，您的老師在課堂上會不會鼓勵學生參加討論或表達意見？』</p> <p>『您的老師與學生之間會不會討論校園內的一些爭議性問題？』</p>	<p>1. 從未；2. 很少；3. 有時 4. 時常。兩題加總：1-4編碼為低度班級討論氣氛， 5-8編碼為高度班級討論氣</p>

『您會不會與老師討論有關政治方面 氛。
的問題？』

社團參與
經驗

『您是否曾經參加校內以關心政治與
社會議題為主的社團？』

『您是否曾經參加校內的社團（政治
與社會性社團、學生會及系學會除
外）？』

1. 有
2. 無

社團參與
程度

『您是否曾經擔任社團幹部或競選社
團負責人（包括學生會及系學會）？』

『您認為自己在學校的社團活不活
躍？』

『您是否時常參與社團的決策？』

1. 從未；2. 很少；3. 有時
4. 時常。三題加總再除以
三取得一平均數，以連續變
數呈現。

與同學討
論政治事
務的頻率

『您與同學或朋友會討論政治方面的
問題嗎？』

『您從同學或朋友的談論中獲取政治
訊息嗎？』

『一般而言，您會接受同學或朋友對
政治事務評論的觀點嗎？』

『您與人談論政治問題時，會引用同
學或朋友的觀點嗎？』

『您與同學談論政治問題時，會不會
因為彼此觀點不同，而發生辯論的情
形？』

1. 從未；2. 很少；3. 有時
4. 時常。五題加總再除以
五取得一平均數，以連續變
數呈現。

使用媒體
的頻率

『您觀看電視(含該台網路新聞)新聞
報導的情況是？』

1. 從未；2. 很少；3. 有時
4. 時常。五題加總：4-12

『您閱讀報紙上(含該報電子報)政治新聞的情況是?』 編碼為低度媒體使用頻率，13-20 編碼為高度媒體使用頻率。

『您閱讀網路上政治新聞(如:Yahoo新聞、Facebook、BBS 等)的情況是?』

『您收聽廣播電台政治新聞的情況是?』

『您觀看電視上政論性談話節目(如:2100 全民開講、大話新聞)的情況是?』

『當您觀看電視(含該台網路新聞)的新聞報導時，您的注意程度為何?』

『當您閱讀報紙(含該報電子報)的政治新聞時，您的注意程度為何?』 1. 從未; 2. 很少; 3. 有時

『當您閱讀網路上政治新聞時，您的注意程度為何?』 4. 時常。五題加總再除以五取得一平均數，以連續變數呈現。

『當您收聽廣播電台政治新聞時，您的注意程度為何?』

『當您觀看電視上政論性談話節目時，您的注意程度為何?』

將之劃分歸類為法社科類學院(包含社會科學院、國際事務學院、傳播學院及法學院)、非法社學院(包含外語學院、文學院、教育學院、商學院及理學院等其它

就讀學院類別

將大學生於問卷封面所填寫之「受訪者之科系」來歸類其所屬學院。

學院)。

父母政黨 認同強度	『請問您父親是非常支持該黨，還是普普通通？』 『請問您母親是非常支持該黨，還是普普通通？』	1. 普通；2. 非常。兩題加總：1-2 為父母政黨認同強度弱，3-4 為父母政黨認同強度強。
與父母親 討論公共 事務頻率	『您的父親是否與您討論與公共事務有關的問題(如社區問題、社會福利、選舉、公共政策...等)？』 『請問您會不會與父親討論有關政治方面的問題？』 『您的母親是否與您討論與公共事務有關的問題(如社區問題、社會福利、選舉、公共政策...等)？』 『請問您會不會與母親討論有關政治方面的問題？』	1. 從未；2. 很少；3. 有時；4. 時常。四題加總再除以四取得一平均數，以連續變數呈現。
是否住 在家中	『請問您現在是與家人同住？住學校宿舍？在外租屋？或其他？』	1. 住在家中 2. 不是住在家中
與父母 親疏程度	『請問您和您父親的親疏程度為何？』 『那和您母親呢？』	1. 非常疏遠；2. 有點疏遠；3. 有點親近；4. 非常親近。兩題加總：2-5 為與父母關係疏遠，6-8 為與父母關係親近。
政治效能 感	『像我這樣的人的看法，政府官員是不會關心的。』 『像我這樣的普通老百姓，對政府的	1. 非常同意；2. 同意；3. 不同意；4. 非常不同意。 三題加總：3-7 為低政治效

政策是沒有什麼影響力的。

能感，8-12 為高政治效能感

『像我這樣的人，是很難了解政治的事情。』

『美國總統是誰？』

『請問目前立法院最大的政黨是哪一個黨？』

政治知識

『我國監察委員的任命需經那個機關同意？』

『中國大陸的國家主席是誰？』

『聯合國總部設在那個城市？』

0. 答錯；1. 答對。五題加總：0-1 為低政治知識，2-3 為中政治知識，4-5 為高政治知識。

『請問您有沒有投書給報紙，來表達您對政治議題的看法？（不管有沒有被採取）』

『請問您有沒有叩應（call in）廣播或電視上的政論性節目，來表達您對政治議題的看法？（不管有沒有接通）』

政治參與

『請問您有沒有在網路上表達或回應您對政治議題的看法？』

『您是否常參加或聆聽學校所舉辦的有關公共事務或社會問題的演講或座談會？』

『您是否曾經向學校提出與校務有關的意見？』

『請問您是否曾經加入或發起爭取學生權利的校園活動？』

1. 從未；2. 很少；3. 有時；4. 時常。六題加總：5-9 為低政治參與，10-12 為中政治參與，13-17 為高政治參與。

政治興趣	『在選舉期間，請問您會不會關心選舉的新聞？』	1. 完全不關心；2. 不太關心；3. 有點關心；4. 非常關心。1 為低政治興趣，2-3 為中政治興趣，4 為高政治興趣。
政治練達程度	將政治知識、政治參與及政治興趣三題合併。	3-5：低政治練達程度，6-9：高政治練達程度。
性別	以受訪者自填式勾選自己所屬性別為男性或女性。	1. 男性 2. 女性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	『以您所瞭解的臺灣社會狀況，請問您認為您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是屬於哪一個階層？』	1. 下層 2. 中下層 3. 中層 4. 中上層 5. 上層